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10月30日第10期

本期目录

【民间资料专辑】

本刊特稿

李晓航 与上海学者谈合作编辑文革资料

阅史漫笔

王 锐 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

史林一叶

胡庄子 毛泽东与红卫兵报刊

陈益南 文革中湖南（长沙）的民间报刊

蓦然回首

黄肇炎 文革中一家独具特色的油印小报

故纸堆

王 锐提供 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红卫兵“战果”

韩平藻提供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二·二五”批示有关文件

萧世敏提供 中央首长1969年10月19日凌晨接见贵州汇报团时的指示

任冬林整理 一个社队企业的两份报告

周继能 史料上记载的老校工徐霏田之死

昨日心迹

向卫国 献血（日记两则）

王端阳 文革一周年时北京见闻（日记数则）

编读往来

丁蕴华谈杜钧福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杜宇秋来信谈蔡文彬文章

【民间资料专辑】

说明：由于文革时期档案至今不开放，民间资料在文革研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类资料，不仅包括现在收藏界比较注意的当年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大

字报选、大事记、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印刷品，还应包括不同身份人士的检查交代、日记、书信、工作笔记、诗文手稿、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的手抄件、美术作品、照片，以及未被归于官方档案中的当年其他文字资料。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一些当事人的离去，许多民间资料已经散失、湮灭，对尚存的民间资料抓紧进行抢救性的收集和整理，已经刻不容缓。本刊特编此专辑，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文革民间资料的重视和对收集、整理工作的支持。

【本刊特稿】

与上海学者谈合作编辑文革资料

李晓航

从2011年最后一期《记忆》上获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金大陆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正在筹建上海文革资料库，并打算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他们的工作与我个人多年来所从事的文革资料收集与研究，不谋而合。如果与他们合作开展此项工作，取长补短，良性互动，应该会有好的成效。

随即打电话给上海社科院，找到金大陆研究员，向他表明我的合作意愿。得到他热情回应后，给他发出一封邮件。我在邮件中说：“你们的眼光和胆识令人敬佩！如果有机会，我很乐意与你们合作交流，当然这种合作交流不应仅限于资料的交换，最好能选择一个项目，比如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之类。”

当日，收到金大陆研究员的邮件，他说：“我与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正式谈过一次你的情况。你广泛收集文革资料的行为令人尊敬。我们正在复旦大学建设一个文革资料库（副本在社科院），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去，你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我的想法是，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使我多年收集的文革资料成为文革研究的共享资源，设想从双方的库存中挑选一部分有价值的文献，合作出版《上海文革史料集》。

经多次沟通，金大陆研究员认同我的想法。他在邮件中说：“从我们两处选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合作编选《上海文革史料集》的思路是对的，我和光耀也有这样的计划，今年就可能会有三本问世。至于怎么编，哪些资料是有价值的？还要认真讨论。我以为一些‘大路货’、流传很广甚至我们已列入开放的材料，没有编选的价值。一些少见的价值高的才有编选的必要。”并告我：“我和光耀教授已决定10日傍晚到襄阳，我们时间很紧，希望当晚就能见面，谈谈相互的看法。宋永毅的文革电子版资料库做了很大的贡献，将社论和首长讲话，及相关文件、公报等搜罗一遍，为跨进文革研究的大门铺平了道路。复旦文革资料库则是区域性的，我们也不必与宋的工作撞车。所以，我们现在一是追求‘深部和细

部’的资料，二是考虑先以纸媒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搭建了《上海文革研究资料库》的工作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以编号本样式出现，你完全可以正式加入进来（你独立编，或与我们合作编都可以）。当然，前提肯定是迄今复旦文革资料库中没有掌握的资料，因重复编印没有价值。所以，我希望当晚就能谈出个结果，有了结果第二天再看材料。”

2012年2月10日下午6点多，金大陆研究员、金光耀教授乘飞机来到襄阳。金光耀教授的博士生王芳已先期抵达。金大陆研究员介绍了他们目前做的文革研究项目，一是上海文革口述史，分三部分，由三个人做，从海外回来的上海文革研究学者李逊负责工人部分，他负责红卫兵部分，金光耀教授负责干部和知识分子部分。二是在复旦建上海文革资料库，资料来源主要是上海的文革资料收藏者陈国康捐献的，原件放在复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存一套复印件。三是出上海文革史料集。

谈到合作事宜时，金大陆研究员希望我把所藏的上海文革资料纳入复旦文革资料库，像陈国康先生那样，以我的名义在复旦历史系建一个专柜，并要求学生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注明出处。我解释道：“我自己也在做文革研究，如果把资料放到复旦去，我就无法使用了。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他说明：“我说的在复旦建一个以你的姓名命名的专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肯定会有一些后续的合作开发项目，因为正如你说：大家都是搞研究的。我们不一定要你的原件。我们的资料库建设也已经有较为厚实的积累。我想，或许我们之间可以交流、交换；或许我们可以花钱购买你部分材料的使用权，以补足我们的欠缺；或许我们可以合作编辑《上海文革资料选》等。或许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一起商量讨论。我们现在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花自己的钱款，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复旦和社科院建设这个平台，带领一批硕士生、博士生进入中国文革研究领域，也为后来者奠定基础。”

好在大家的目的是是一致的，关键在于需要在方式上寻找一个契合点。我说：“正如你所知道的，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储备基础上，才能扎扎实实做好学术研究。在你所开列的几种合作方式中，我对编辑上海文革资料比较感兴趣，资料交换次之，花钱买就不能称之为合作了，可以不考虑。编辑资料的前提是出版，但出版文革资料又面临很大的未知数，如果出版问题能解决，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合作方式。我的最终目的，是把我的文革资料转化成大家共享的学术资源。”

在上海文革史料集的编辑问题上谈得很顺利。金大陆研究员说：“关键的问题：一是看你处收藏和复旦文革资料库所收藏的资料是否重复。若复旦等高校的其它资料，复旦方面没有掌握的，则可编选。若你掌握的量足够撑起一本，你就独立编，我们帮你出。如果你的量只是一部分，我们也有一部分，就合作编。二是看资料的价值，即只要价值高，都可以汇总编选。每本资料集写一篇二、三千字的题解，并对资料所涉及的人物、地点、事件作注释。我们打算搭建这种开放式平台，出版一系列上海文革史料。出版方式有两种备选，第一种是正式出版，

这种方式目前虽然比较困难，但可以争取。第二种方式是做成供内部交流的自印本。”

金光耀教授说，五十年代出的很多学术著作都过时了，但那时编的史料集，现在还在用。有些现在写出来的文章，当新的史料出来后，很可能就过时了。金大陆研究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样的史料集，比出个人专著更有价值。史料集比个人专著更有生命力，引用的频率更高，价值更大，对研究更有推动力。

我感到，他们二位起意编这套上海文革史料集，是有战略性学术眼光和一定学术担当精神的，也表明上海的学术氛围比较开放。

最终，在共同编辑上海文革史料集的问题上，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



吃晚饭时，大家聊到目前文革研究现状，我说，各地虽然都有一些有成就的文革研究学者，但都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缺乏沟通与交流，资源没有整合，许多潜在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大家对文革研究的严峻环境深有同感。

上图：李晓航（左3）与金大陆（左2）、金光耀（右1）及金光耀的博士生王芳（左1）合影。

我问金大陆研究员：“写文革的书现在一般是很难出的，为什么你的《非常与正常》能顺利出版？”他说，这本书写的不是政治运动史，是社会史，审查容易通过。再一个原因是，负责审查的中央党史办的人对他“史料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比较肯定。

次日，他们一行来到我家。我早已把整理好的上海文革资料分类摆放在茶几上。妻子忙着端茶倒水削水果。他们挑选了一整天，挑得很仔细，每一份每一页都认真过目，特别关注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细节信息。每发现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便评点一番，不时发出欣喜之声。对盖有群众组织公章的传单格外感兴趣。他们在整理上海一位当年造反派头头的工作笔记时，曾看到里面提到一个“集司”的群众组织，只知道是集体事业系统的造反组织，但这个“集司”的准确全称却讲不清楚。他们发现在我收藏的一份传单上面，盖有一个清晰的“集司”公章，“集司”的全称是“上海集体事业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公章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难题，以这个公章为依据，可以对“集司”作注释了。

他们一边找资料，我一边与他们聊有关文革资料的事。王芳问及我“为什么想到要搜集文革资料？怎么会收集这么多？”我说：“我觉得文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资料会越来越少。做文革研究，必须掌握

大量文革资料。我收集的重点是一些大城市的材料，大城市材料更能反映文革的过程和特点。收集的渠道，一是各地的旧书市场，每年利用到外地出差的机会，在各地旧书市场逛逛，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二是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是目前最大的文革资料集散地，我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旧书网上选购文革资料，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收拆全国各地寄来的文革资料邮件。每份资料都已编入目录，便于查找使用。”

金大陆研究员问及我的研究方向，我说：“我对各地的文革大事记比较感兴趣，打算做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开始后三年的大事记，刚刚起头。但这项工作太浩繁，出版又很困难，所以暂时搁下了。”他说：“不要等。现在就做，即使出不了，做完了先放在那儿，不要等机会来了才开始动手，那就晚了。”

在挑选资料过程中，他自言自语道：“李晓航整理文革资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他的目录做得好。”我妻子接过话茬：“他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但他的哪份资料放在哪儿，他立马就能找出来。”我说：“我做文革资料工作，一是有兴趣，二是执着专注，三是注重整理。”

吃中饭时，我提到一件往事，东北的某所大学也很注重收集文革资料，曾经也想跟我合作出版资料集，但没有谈成，他们的合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要我提供资料，但不署名，出版后送我一本他们编辑的资料集。另一种是我署名，他们出，但所有费用由我支付。金大陆研究员和金光耀教授对这种合作方式表示不认同。

他们仔细挑选了 200 多份上海的资料。但文革报刊部分没挑，因为他们未及做复旦文革资料库目录，没办法查对哪些是他们已经有的。如果他们手头有自己的目录，这事就变得很简单了，我建议他们尽快编制目录。

金大陆研究员说，从挑出的资料看，可以编四、五本，复旦大学大字报一本，揭批“四人帮”的一本，上海各大学的一本，上海首长讲话一本，“共向东”问题一本。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是油印的，字迹难以辨认，无法扫描，只能靠人工打字进行输入。

2012 年 3 月 14 日于襄阳

【阅史漫笔】

有关文革小报的几个话题

王 锐

在文革小报的收藏及研究中，有些问题一直让人深有兴趣，并且，其中有一些甚至至今无明确定论或比较一致的说法，属于“悬案”或是“待解之谜”。也正由此，才引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海内外藏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关注。这里，笔者就相关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或有研究的各界朋友。

1、究竟有多少种文革小报

一共有多少种文革小报？换句话说，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究竟是多少？这肯定所有海内外藏家及研究者最感兴趣的首要问题。要说有“待解的文革小报之谜”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谜团”了。

笔者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也一直深有兴趣，并试图努力求解。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做到有清晰准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说，还处于努力探索中，有初步的结论，但尚待证实与认定。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多种说法，不同的渠道存在不同的数字版本。

仅笔者眼见所及，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

1、近 5000 种说。这是古阳木先生所撰《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给出的数据。该文称：“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铺天盖地而来。据初步估计，在 1966 年夏季至 1969 年夏季，全国这类报纸大约有近 5000 种之多。”（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载《重大决策档案（往事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年 10 月）所说“近 5000 种”，也就是说，接近 5000 种，但尚不足 5000 之数。

2、5000～6000 种说。杜永平、周连成先生编的《文革小报目录》，收有文革小报 4000 多种，除去其中的党报“电讯版”，省、市、地、县革委会机关报，还有院报、校报、企业报、部门报等，以及重复收录者外，大约有 4000 种左右。而马振予先生在其“代序言”中说：“全国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创办的文化大革命小报（简称文革小报，也称红卫兵报），却铺天盖地而生，大约有五六千种之多。”（马振予《非常年代的历史见证》代序，见杜永平、周连城编《文革小报目录》，2004 年 12 月）马振予先生这里给出的大约数字在 5000～6000 种之间，也就是说，文革小报的总数可能是 5000 种，也可能是 6000 种左右，甚至 6000 多种。

3、6000 余种说。笔者的作家朋友，在《成都晚报》副刊部做编辑的蒋蓝先生，为文革小报收藏研究对笔者做过专访。其后的 2005 年 4 月，蒋蓝先生发表在《新书报·人物风》上的相关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出版的‘文革小报’达到 6000 余种，其中北京就有近千种。”又说：“对‘文革小报’研究，是西方近 30 年的事情，其收集资料之全，之细，研究成果之多，远远在国内前面。”（蒋蓝《王锐：研究“文革小报”第一人》，载《新书报·人物风》2005 年第 13 期，2005 年 4 月 3 日—4 月 9 日）照上文看，蒋兄的数据似乎来源于海内外相关资料。其后，笔者见到蒋兄，问及其文章中涉及的资料来源。蒋兄答复来自网上查到的资料，肯定有其出处，但具体出自什么地方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4、6000～10000 种，很可能是 8000 种说。2005 年秋季，笔者《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一书初步完稿之际，一次，与笔者有小报交流之谊的陕西合阳李先生通话，顺便提及这一情况。李先生电话中告知，关于文革小报的总数问题，据北京一位收藏小报多年，对之也颇有研究和心得的王先生估计，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

总数，不止于 6000 种，但也达不到 10000 种之数。因此，其总数可能在 6000 至 10000 种之间，很可能在 8000 种左右。遗憾的是，这位北京王先生，笔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联系方法，未能与之作更深入的交流切磋，在此仅存此一说（而且是由第三人转述），无法作进一步的举证。

5、群众组织报刊 10000 种以上说。2006 年春，笔者的助手李黎先生在《世纪中国》网上查阅并下载陈东林先生《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一文。其中陈先生有这样一段表述：“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 10000 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载《世纪中国》2000 年 12 月 8 日）也就是说，按同样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陈东林先生的说法，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不仅是小报，还包括刊物）的总数“在 10000 种”以上。但其中除去“刊”后的“报”是多少？不详。

以上所见，笔者见到的目前藏界学界对此的说法与估计，有这 5 组不尽相同的数据。

现在再来谈谈笔者的看法。这些年的接触与探索，对中国文革小报总数的估计，原来我倾向于大约在 5000 种左右这一基本估计。不过，近年的收藏实践与研究中，看法则有些改变。尤其是仔细研究了杜永平、周连城两先生合编的《文革小报目录》之后，笔者更倾向于最后的北京王先生那个估计，即当年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多于 6000 种，少于 10000 种，很可能在 8000 种上下。

笔者作出这个估计或推断的依据，主要是从笔者收藏较多的一些省市文革小报，与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所收报目相比较，而显示的该《目录》的遗漏比例推算出来的。由于各种原因所局限，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难免有所遗漏。但这种遗漏的比例究竟有多大，这是笔者（也同时是见过这册《目录》的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掌握了解到这个“遗漏”比例，即可大致推算出整个文革小报的总数。

以笔者藏品中较多者，如四川、北京、上海等地的情况来分析，杜、周《文革小报目录》的遗漏比例大致在总数的 1/3，或者还多一点。杜、周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收录报目 4000 种左右，因之，照此比例推算，实际的总数应起码在 6000 种以上，接近 7000 种，也有可能达到 8000 种之数。

也正由此，笔者支持北京王先生那个估计：中国文革小报的总数不止于 6000 种，但不足 10000 种，很可能在 8000 种上下。这是笔者多年探索后得出的一个基本估计。

2、文革小报最多的省市

这是与第一个“谜团”多少有些相关的第二个“待解之谜”。文革中，全国除台湾之外，29 个省、市、自治区中，哪一个省市出刊文革小报最多？这也是海内外对文革小报感兴趣的藏家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文革小报是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尤其是到了其发展兴盛期，红卫兵、造反

派分化演变成对立派别后，小报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不同派别中“派性”的产物，是红卫兵、造反派发动展开“文攻”的利器。由此角度出发，哪个省市小报办得多，即可说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的“山头”多，也可探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派性”严重，“派性”闹得厉害。而文革中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还是以杜、周两先生合编的这册《文革小报目录》作基础来分析。在《目录》中，小报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共收录小报 543 种（应淘汰排除的仍暂计算在内），最少的地区是宁夏，仅 4 种。

照《目录》所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革小报的“冠军”，似乎应当非北京莫属。而且，上一节所引用的笔者友人蒋蓝先生文章中，也有这样一句表述：“其中北京就有近千种。”此外，陈东林在《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一文中，也谈及：“据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 900 多种，上海 300 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 300 种以上……”（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载《世纪中国》2000 年 12 月 8 日）当然，如果北京真有“近千种”或“900 多种”文革小报，这个“冠军”的称号确实当之无愧。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尚无权威资料认定之前，此结论暂作一说，但也存疑，需要进一步佐证。

在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第十六章专门论述“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其中，以附表形式详细列入了“上海‘文革’运动中主要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58 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81 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各系统、单位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233 种，“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在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61 种（其中有两类情况：一为因武斗，外地组织在上海制造舆论，主要是江、浙地区及新疆等地；二为外地组织插手上海文革运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第一版，下卷第 256—290 页）以上几个数字相加，共有 433 种。但这些数字都是指的“报刊”——即不光是小报还包括刊物。那么其中的小报到底占多少？是否已经包括当时上海文革小报的全部？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有希望与北京争夺文革小报之“头把交椅”的，是笔者家乡四川省（包括当年属四川省辖的重庆市）。笔者系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又多年蜗居四川，得“地利”之便，所收藏的近 2 千种文革小报中，四川占了近 1/4，约 500 种。

杜永平、周连成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中四川省收录有 340 种（还不包括重复及不属于文革小报者），大约占笔者现存的四川文革小报的 2/3。这也是笔者认为该《目录》所收录者，与实际情形相比，大约有 1/3“遗漏”的主要依据之一。

而笔者目前所收藏的四川文革小报近 500 种之数，则肯定不能代表当年四川全省所出文革小报的全部，其中仍有相当遗漏。这个遗漏数字有多大？笔者以藏报的实际，联系当年四川各地出报的情形，又大致作了个推算，估计遗漏数仍有 1/3 甚至多一点。这样推算下来，四川当年的文革小报种类，应当在 700~800

种之间。如果真是这样，杜、周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有关四川的部分，其遗漏数就达 50%还多。当然，四川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可能是个特例。

笔者估计，目前自己现存近 500 种四川文革小报，仍有 1/3 甚至更多一点的遗漏，是如此推算出来的：在已收藏的近 500 种四川文革小报中，成都、重庆两市（不包括现在已划入成、渝两市的地、县）占绝大多数，近 400 种，而成渝两地之外的专区县、市，已藏者不足 100 种。笔者认真分析后估计，成、渝两市遗漏者，还在 100 种以上，而其他地、市、县的遗漏数，应该比这个 100 种的数字更高。两者相加，共在 200 种至 300 种之间。这是因为，四川当年是一个大省，除成都、重庆、自贡三个省辖市外，还有 10 多专区及专区所辖的 100 多个县（市）。专署驻地及每个县（市）应当至少有一份铅印小报（当年每个县、市均有一家能印铅字版报纸的印刷厂，有条件印铅字小报。如当年属于四川比较偏远的县，誉为“熊猫故乡”的平武县，也办有一份《万山红》小报），多的地市，则达数种以至 10 来种小报，如泸州市（属宜宾专区）有小报 10 余种，宜宾市（宜宾专署驻地）近 10 种，内江市（内江专署驻地）、涪陵市（涪陵专署驻地）、绵阳市（绵阳专署驻地）等，都在 6、7 种以上。平均以每县（市）2 至 3 种小报计算，四川省内各专区、县（市）的小报就有 200 至 300 种之多。

这样推算下来，四川全省文革小报数，应在 700 至 800 种之间。若真是如此，四川就有可能与北京争夺文革小报之“头把交椅”的资格。杜、周两先生所编的《文革小报目录》，收北京小报 543 种，再加上 1/3 比例的遗漏数，北京大约总数就在 700 至 800 种之间。这就极有可能与四川不相上下。

当然，这只是笔者推算探索一番后的一家之言。实际情况如何，尚待一部比较完整、权威的《中国文革小报目录》问世后，方能最后予以结论。

本稿写成后，笔者又得到朋友提供的一个数据——《重庆市志·报业志》（修订稿第 129 页）记载：“据重庆市档案馆对现存文革小报的统计，‘文革’期间，各造反派组织在我市编辑发行和流传的派报达 1639 种。其中，我市‘815’派办的有 313 种，‘反到底’派办的有 195 种，来自北京、全国各省市、我市各专县和军队造反派组织办的小报共 1131 种。”重庆档案馆所在的沙坪坝区，文革武斗中是八一五派控制区，故所收八一五派小报较多（但也不一定就是全部），反到底派曾在武斗中大量外逃到成都、宜宾等地并在那些地方办有小报，重庆档案馆是否都有收存？此外，该记载中没有把“我市各专县和军队造反派组织办的小报”包括在重庆两派文革小报之中。因此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是重庆地区文革小报的完整、准确的数字。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不知重庆档案馆所称的这些文革小报是否包括了油印小报在内？若都是铅印小报，从这个数字看，仅重庆一地的小报就已经超过 500 种，加上成都和其他地、市、县，四川小报就在 1000 种以上了。

3、文革小报是否有“号外”

当年的文革小报是否真正出有“号外”，这也是令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在

没真正见识过某种文革小报的“号外”之前，笔者对此也是持存疑态度的。

这是因为，不管从文革小报诞生，以至后来大行其道之社会政治大背景来讲，还是从文革小报编辑的特点来讲，似乎都不容许“号外”这种报纸的特殊形式出现于红卫兵、造反派们编辑创办的文革小报之中的。

先说“号外”的特性。相关资料对“号外”是这样表述的：“报纸号外是指定期出版的报刊，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在前一期已经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而临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因此称作号外。号外还应无售价，免费发放赠阅，多为单页。”（马振予《我看“号外”》文后所附“资料”，载《藏书报》第4期，2005年12月26日）

再说文革的政治大背景。文革以“革命造反”为主要标志（“造反派”这一新称谓正由此而来），又以“破四旧”“立四新”为主要内容之一。而“号外”这一国际新闻界通行的报道重大的新闻和突发事件的特殊形式，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货色”，遭到批判诋毁而被普遍废弃。一时间，不说是民间小报，就是官方正宗的省市级党报，遇有重大新闻需特别抢时报道时，也再不敢用“号外”之名，而代之的是“快报”“喜报”“特大喜讯”之类不伦不类的称谓。好长一段时间，“号外”从中国的新闻媒体中似乎彻底消失了。

再次，从文革小报的特性来看，似乎也不需要“号外”这种出版形式。文革时期，各红卫兵、造反派自办的小报，受种种因素限制，一般带有不能定期出报，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特点。哪怕是发展鼎盛期，很多小报也像模像样地公开征订，甚至通过邮局正规官方渠道发行，但其不确定性的因素仍然很大。这种出版日期本身并不十分确定，且出报周期一般较长的小报，遇有特殊突发事件重大新闻时，似乎用不着，也无相应条件来赶出“号外”之类。况且，小报中还有“专刊”“特刊”“增刊”之类的形式可供选择，“号外”之类似乎无从谈起。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官方报纸已经废用了“号外”这种出报形式，造反派小报再用“号外”就显得更不合适了。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大多数人士在没见到文革小报“号外”真品之前，对文革小报是否真发行过“号外”，基本上是持存疑态度的。

2005年国庆前后，笔者在与藏友陕西合阳李先生作小报交流时，竟意外发现对方提供的交换目录中，居然有一份吉林农业大学红卫兵小报《新农大》的“号外”。

这份笔者用一份小报“创刊号”交换来的“号外”从陕西邮来，仔细审视后发现，从形式上看，它确实是一份“号外”。该“号外”有两个版（此点也不符合上述“号外”“多为单页”的标准），一版上方是“毛主席语录”，有些类似传单的排印形式，之下才是用毛主席手迹拼成的《新农大》报头，报头右侧有竖排的印刷体“号外”两个大字。主办者为吉林农业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总部。“号外”所载内容，就是一篇该总部发表的题为《对我市目前形势的看法》的长文，共分15个部分（即该总部对局势的15点看法），并有一段“结束语”。在第2版右下角，还有一份该“总部”的第1号《通令》。

这份《新农大》“号外”，出刊于1967年2月6日，从时间上及全国文革总的形势看，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后，各省市展开全面夺权的阶段，局势处于激烈动荡，各方面矛盾尖锐，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吉林农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总部用小报出“号外”的特殊方式，表明自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不外乎希望引起各方注意，了解自己对局势变化所持的立场和政治态度。

不过，以笔者的看法，这份所谓“号外”其所刊载的内容，不是及时迅速，甚至“抢先”报道能引起社会震动的重大事件和新闻消息，而不过是一个造反团队对局势的某些看法及表态之类，与“号外”这种特殊新闻载体的特点与功能，大相径庭，似乎有点“张冠李戴”，名不副实。笔者以为，这份“号外”，充其量只能算是该小报的“专刊”“增刊”之类，不能叫真正的“号外”。因为它不具备报纸“号外”的内容特色与功能。

不过，这份《新农大》“号外”，确实又是以“号外”的形式问世和存在的。分类上，仍是应将其视作小报“号外”而归类。

2006年前后，笔者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终于得到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小报之“号外”。

这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工人造反报》的一份“号外”，出刊于1967年12月3日。版式为对开单面印刷，整版套红，除了上方的毛泽东头像及“四个伟大”的“万岁”口号外，与当时《人民日报》等官报的“号外”的标准格式大体相同。这份“号外”的整个内容，就是全文刊载《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贺电》。中央文革小组《贺电》内容如下：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转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

热烈祝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召开。我们相信，曾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过光辉贡献的上海工人阶级，必将经过此次会议，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为彻底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

笔者以为，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工人造反报》出刊周期来衡量，这才算得上是一份真正的“号外”。从内容看，是中央文革小组这种几乎取代了党中央的权威机构，给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专发的贺电。以文革时期造反派的眼光看，这自然是给王洪文控制的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上海工人造反派足够的面子（文革中，由中央文革小组给一个地方的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发贺电，笔者印象中，似乎仅此一次）。因之，无论是对上海“工总司”，还是对《工人造反报》

来讲，这十足该算“重大新闻”“特殊事件”，甚至是“特大喜讯”，完全符合关于“报纸号外”内容方面的界定和表述。从报纸出刊周期来看，“号外”的出刊，必须是“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工人造反报》创刊以来，一直保持着周二刊的格局，出刊比较规范、及时。这份“号外”出刊的1967年12月3日，也正是“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间隙期。因此，其间遇重大事件而发“号外”，也符合报业行规。不像前述《新农大》“号外”显得有些名不副实。

4、文革小报编辑人员的构成

文革小报的编辑人员构成如何，换句话说，当年编辑出刊那数千种，以十万计的小报是些什么样的人？是纯粹的民间业余人士（包括学生红卫兵），还是有新闻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文革小报从类型上看，似乎应分为两类，一类即真正的“红卫兵小报”，而另一类则可统称为“造反派小报”。前者是由文革中的红卫兵主办，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学生（当然其中可能有少数教职工参与，但绝大多数编辑人员及撰稿者应是学生）。而后者的主办编辑人员，则是属于机关、厂矿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显然，这两者是不大相同的。前者以十多二十岁的在校青少年学生为主，后者则主要是有社会经验和实践的中青年人。

这样，就大致可以断定，真正的“红卫兵小报”，其主办者，包括一切采访、编辑及撰稿人员，其主要是在校学生。在校学生，自然属于民间的，纯业余的非专业新闻人士。

而“造反派小报”，其主办者及编辑、撰稿人员，则肯定要复杂得多。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指红卫兵之外），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士，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甚至包括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以至公检法人员、军人等。这样，原来身处各类报社、电台、杂志社等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等新闻专业人士，肯定有相当部分加入了“造反派”行列。不排除这些人参与文革小报的编辑、组版及采访撰稿等具体事务中。

由此可以说，文革小报中的“造反派小报”类（占整个文革小报的大多数），就不完全是纯民间的业余人士所为，而肯定是有数量一定的新闻专业人员参与其中，只不过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代表其供职的官方媒体而已。

问题是，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这也是在文革小报研究中，笔者深感兴趣并一直在关注探索的一个问题。当然，最有发言权的，是当年曾经参与过文革小报编辑等活动的人士的回忆文章或记叙材料之类，但可惜迄今为止笔者未曾见到过任何一篇谈及参与主办编辑“造反派小报”的相关文字和材料。看来，似乎经历过这类事的人士不愿意提及当年那段往事。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正如许多文革亲历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年是“造反派”一样（毕竟，在当局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承认自己参加过“造反派”，并不是那么光彩的事），一些人肯定也不愿对人谈及当年曾编辑过（甚至很热衷）造反派的文革小报。

如此，这一问题只能暂时依靠对相关资料（尤其是原始材料）研究探索来获得。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笔者终于在一份上海小报提供的相关材料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其揭示的是当年在全国都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上海“工总司”机关报《工人造反报》的编辑部人员构成情况，这应当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具有某种“标本”意义的。

由上海出版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造反》，是一份4开小报，从创刊到1968年9月“奉命”停刊，共出报60期，在文革小报中，也算出刊较多者。

1968年夏，为迎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出版系统，上海市出版系统革筹小组派出数支所谓“出版革命调查小分队”，赴上海一些工厂、农村，及解放军驻沪部队等基层单位作调查及召开座谈会，“向广大工农兵请教”。之后，其小报《造反》已成“停刊号”的第60期第1版，以《工农兵谈出版革命》为题，刊载了一份比较详尽的“座谈会纪要”，摘登了所谓“工农兵代表”的发言。其中一位被小报编者称为“同济大学‘五七’公社青年教师”的发言，就谈及有名的上海《工人造反报》当时编辑人员的构成情况。报载的该青年教师发言全文如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据了解，《工人造反报》三十几个编辑，其中二人来自《新民晚报》，三人来自解放军，其余全是产业工人，其中有的58年还是文盲，但他们的报纸搞得真好。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要走这一条路，要有一支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编辑队伍。

从同济大学这位青年教师的发言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组建规模和人员构成情况。其一，《工人造反报》有编辑人员30多人，这在当时算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编辑队伍。《工人造反报》非日报，而是大致维持在每周两期的出报量，这样的出报量，30多人的编辑队伍应是足以对付的；其二，30多编辑人员中，有两人来自《新民晚报》（文革初期改名为《上海晚报》，1967年2月停刊），算是新闻专业人士。其他3人来自解放军，有可能是部队新闻干事或报刊通讯员之类，其余皆为工人。尽管前两种人所占比例不大，但还是由此可以证实，文革小报的编辑队伍中，有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参与其中。

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京沪等大城市一些新闻单位造反派所办的小报，如北京的以“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新闻分会”名义办的《新闻战线》，以“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名义主办的《新闻战报》，以及新华社“新华公社为人民服务红卫兵”主编的《新华战报》，上海新闻界革委会（新革会）主办的《新闻战士》等，这些造反小报的编辑人员，肯定是以专业新闻界人士为主无疑。

5、文革小报也发“记者证”

“记者证”是报刊编辑部从事外出采访活动的人员，证明其新闻采写资格的身份证件。一般来讲，只要是正式注册的报纸、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都有外派新闻采访人员的资格，其外派记者持有“记者证”从事新闻采访活动，既合理又合法。

建国以来，我国的报刊全为官办，纯粹民办报刊几乎没有。因之，“记者证”的持有和发放，就成了极带“官方色彩”的行为，管理甚严。

文革小报的兴起，以及其后在各省市遍地开花，甚至在社会上走红那段特殊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新闻报业的格局和现状。各类小报，均为红卫兵及造反组织自办，编辑采访人员，自由确定，且随意性很大。其“编辑”“记者”资格，并不一定要经某个权威机构认可。这也是文革小报的一种特殊性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小报发“记者证”，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当时有势力，有影响的主流小报。

不过，尽管如此，笔者却从未真正见识过当年文革小报的“记者证”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年，在各地旧书报藏品市场上，笔者也特别留心，看能否找到这类证件，以开眼界，并作资料留存。可是总未能如愿。各城市古旧品市场上，各类“红卫兵”“造反战士”，以及“上山下乡”之类的证件、胸标、袖章见得不少，小报、资料及各类文革杂件也可寻觅，就没见过当年小报的“记者证”。

当然，关于小报也发“记者证”的信息，在当年的小报上还是偶尔能透露出来，让外界及后世知晓其事。

笔者见到的关于文革小报“记者证”最早的信息，是在上海《红卫战报》刊载的一则《启事》上。1967年4月7日出刊的《红卫战报》第32期，第4版右小角有一则《本报启事》，该《启事》共有4条内容，其中第4项为：

四、自即日起，本报工作人员一律使用横式白底红字记者证，原竖式白底黑字或其它证件统统作废。

《红卫战报》是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报纸，最早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主办，因“《解放日报》事件”而闻名全国。以后，因著名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红革会”遭到重大打击，《红卫战报》改由“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但一直是上海红卫兵小报中的主流报纸，其在上海的影响和地位是其他红卫兵报纸不能取代的。

也正由于这种因素，《红卫战报》才敢于公开印制发放自己的“记者证”，而不担心受到当局的干预和责难。《红卫战报》这里向公众“声明”用“横式白底红字记者证”，替换原先“竖式白底黑字”的“记者证”，想必自有其内在缘由。但由此也可推断，《红卫战报》发放“记者证”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大概在其创刊不久的1966年11月或12月份，即已在开始发放、使用“记者证”了。因之，1967年4月初，才有换证之举。

此外，笔者见到的关于小报发放“记者证”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在1968年8月14日出刊的上海《财贸战报》第56期，其第4版左下角刊有一则《声明》，全文如下：

声 明

兹遗失本报记者证一张（白底蓝花纹，编号104），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编辑部

上海《财贸战报》，是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财革会”）主办的一份小报，创刊于1967年3月。上海财革会，属于上海市整个财贸系统造反派的大联合组织，与上海“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新革会”（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属于上海“工总司”下面几大主要的归口造反组织，颇有影响和势力。因此，直到1968年下半年，其他小报纷纷停刊关门之后，《财贸战报》也出刊得很正常，而且与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以及文艺口的《文艺战报》，体育口的《体育战报》等少数小报一样带有半官方的特点和性质。所以，《财贸战报》敢于像正宗官方报纸一样发放“记者证”。想必也是经过了官方（上海市革委会或某个部门）的某种认可。

从这则《声明》看，《财贸战报》所发的“记者证”，不是以“本”论，而是以“张”论。因此这份“记者证”极可能是单页样式，“白底蓝花纹”，“花纹”估计是带有“防伪”的功能。

笔者推断这份《财贸战报》带有某些半官方性质，从这则《声明》旁边编辑部刊载的一则无头“启事”和“通知”上，也可以得到佐证。这则无头“通知”内容如下：

为了及时了解、交流各单位动态，请各区、局、公司各级革命委员会（或革命群众组织）将所编印之油印小报、简报、动态等刊物按期寄赠我编辑部二份，以便刊登或参考。

本报编辑部

文革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属于党政合一的政权机构，《财贸战报》敢于用这种语气，向不仅是各公司革委会，而且向各区、局革委会，发出这种似乎上级对下级说话的指令性“通知”，若是一般群众组织的小报，是不能够以这种语言说话的。

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小报“记者证”的另一则信息。

6、文革小报的征订与发行

文革前与文革中，中国的报刊发行只有单一的渠道，即通过邮局征订和发行。而一些企业和机构自办的“内部报刊”不在邮局发行之列，只能自行寄赠交换。

文革中蜂拥而起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均是民办性质。一般来讲，在早期多数是寄赠传阅和交换，少部分拿到街头叫卖，带有自办发行的特点。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官方或被官方认可，有正式期刊号的报刊，才有资格通过邮局渠道公开征订发行。另一方面，邮局征订发行，就必须要求报纸按期准时出报。而这一点，绝大多数小报因资金、纸张及印刷条件等限制，都不可能做到。其出刊带有很大随意性，出刊时间及每月可出期数均难以事先确定。这也是邮局发行的最大难题和障碍。

但对大多数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来说，出刊发展到一定时候，通过邮局正式征订发行，又成了主办者的一种梦想或者说渴望。因为，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这标志着一种身份地位的官方及社会认可。邮局正式发行，表明已进入官方渠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此外，邮局征订发行，确实可以扩展小报的发行覆盖范围，扩大其影响。因之，通过邮局正式公开征订与发行，成了大多数已成气候的小报追求的目标。

最早通过邮局发行的，自然是那些具有相当政治背景、相当政治势力的主流小报。笔者见到的较早在报上刊载改为通过邮局征订发行启事的，要数清华《井冈山》。

1967年1月11日出刊的清华《井冈山》第9、10期合刊上，以“井冈山报社”的名义，刊出一份《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本报启事

本报自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凡北京市读者皆可到本市各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月出版六期，订价一角二分。邮局现已开始办理，欢迎广大革命群众订阅。

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也诚恳希望读者提供批评建议，监督我报工作，共同办好本报。

另外，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还将设立航空版代印点。外地革命群众可径向当地清华大学联络站联系订阅。

井冈山报社 1月9日

清华《井冈山》1966年12月才创刊，创刊仅一个来月，就实现了通过邮局征订发行，由此可见清华《井冈山》能量之大。自然，如同首先搞起“航空版”一样，这与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有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硬后台不无关系。

北京红卫兵小报实现了通过邮局发行，上海也不甘落后。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因引发“《解放日报》事件”搞瘫痪了上海市委而名气大扬，成了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主流小报。“一月风暴”高潮中的1967年1月下旬，其上海首先实现了通过邮局征订发行。1月25日出刊的《红卫战报》第20期，在第3版刊载了一份《本报启事》，称：

为了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要求，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本报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份起交邮电部门发行，在本市接受订户，同时零售。本报五天一期（逢五日、十日出版），每期对开四版，售价三分（六版售价五分）。每月订价一角八分。本市读者如需订阅，可向就近邮电机构和报刊门市洽办预订手续。工矿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需要订阅的，希望组织集体订送。

《红卫战报》在上海实现通过邮电部门征订发行，比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时间更早。上海以后通过邮局征订发行的小报，还有《财贸战报》《文艺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等。

京、沪两地开了先例，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省会等大中城市）一些主要的小报，也纷纷予以仿效，先后将小报通过邮局发行。一度时间，一些主流小报基本上做到了与官方正式报刊平起平坐，读者及社会大众可以在邮局订到该报。这也是小报进入繁荣期或社会主流地位的标志之一。

尽管1968年之后，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但对各地尚存的一些主流小报来说，这种通过邮局发行的既有格局还是维持了很久，甚至一直持续到小报的最终消亡。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自不必说，以其他外省市来说，如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主办的小报《红色风暴》，直到1969年春仍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订。1969年3月下旬出刊的《红色风暴》第221期、224期等各期，连续在第4版刊有一则以“省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和《红色风暴》编辑部联合刊登的《欢迎订阅〈红色风暴〉》的“启事”。“启事”说：

第二季度的《红色风暴》已开始收订。按月收订，破月不订。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及时向当地邮电局（所）办理订阅手续，以免脱订。

该报第4版报脚编辑部地址处，还特别印有一行小字：“订阅处：全省各地邮局 订费：每月二角 零售：每份二分”。

可见，由于某些因素或政治势力在起作用，中央已经明文规定自办发行、自负盈亏的群众组织小报，仍然大模大样地享有官方正式报纸一样的待遇。

7、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

文革小报是否使用过繁体字，这也是海内外学者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古阳木先生《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引用海外学者的看法，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据旅美华裔现代文学专家唐德刚先生的判断，由于红卫兵报刊在研究中的走俏，港台等地还出现了伪造的红卫兵报刊。其依据是，在他过眼鉴定的红卫兵报

刊中，有不少是用繁体字排印的，用语也有些港台流行词汇。其实，前者并不能作为依据。“文化大革命”前夕，虽然公布了两批简化字，但红卫兵组织印刷报刊时条件有限，不得不仍旧使用一些尚未作废的繁体铅字，尤其是在外地中小城市，较为普遍。即使在北京、上海出版的红卫兵报刊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使用。（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应当说，古阳木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的判断有误。是否使用繁体字，并不能作为鉴定文革小报真伪的依据。笔者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是，文革小报中使用繁体字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比较常见。因为当年许多小报是在一些小印刷厂排版印刷的，而那些小厂出于成本及排版工人工作习惯等方面的考虑，并未将原有的繁体铅字全部更换为简体铅字。

当然，通常情况下，文革小报是繁简字混合使用，而且以简体字为主，繁体字只出现在个别地方，特别是一些字号字体不常用的文章标题中，不占主要篇幅，也不是在小报中大量存在。

也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份文革小报，其全部或大部分使用繁体字，既基本可断定此为“伪品”无疑。

8、编辑部出价向社会公众回收自己的小报

四川成都的《惊雷》，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财贸分团所办的小报，每期基本上是对开大报，套红印刷的格局，在成都算得上造反派主流小报之一。1967年7月1日，《惊雷》编辑部在自己的报纸以及兄弟团队办的一些小报上，刊出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惊雷》编辑部启事

为满足外省外地读者需要，现特向本市革命读者原价回收3、5、7期《惊雷》各300份。回收地点：反帝路南段市财干校《惊雷》编辑部。

1967、7、1

编辑部出价向社会公开回收征集自己的过期小报，这倒是个趣事。而且所需量达300份之多。分析起来，小报编辑部向社会回收自己的小报，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这几期《惊雷》小报上，一定有比较受人关注重视的内容，真正有外省市读者来信来电索要购买；其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同有联系的外省外地的造反派团队或小报编辑部作资料交换之用。因编辑部现有存报已不敷使用，只好向社会公众作价回收以应急。

笔者以为，两种可能说不定均同时存在，但后一种可能的因素更多一些。这就是说，随着造反派执掌文革运动控制权的主导地位在各地的确认，不同省区的造反组织（包括其小报编辑部）彼此之间交往联系增多，互相交流信息，交换小报及文革资料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致使编辑部存报不足，遂有回收小报之举。

从这几期《惊雷》之内容来看，第3期出刊于四川“二月镇反”之前，正是成都军内外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的高潮期的1967年2月14日（3天后，中央军委“二一七信件”下发，开始大规模“镇反”）。由此，这期《惊雷》的全部版面，几乎都是对成都军区领导指名道姓的露骨攻击和丑化。第1版的社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即是公开号召同军方斗争，甚至夺权。其中，“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必须彻底砸烂”“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就是成都黑司令部，二者不容混淆”“这样的黑司令部难道不可以炮打吗？”这类针对军方的攻击言辞比比皆是。该社论甚至煽动性号召说：“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揩净身上的血迹，迎着刺刀和枪口英勇地向着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冲锋了！”“同志们，战友们！迎着刺刀、枪口，用鲜血和生命去迎接大夺权斗争的最后胜利吧！”

翻开第4版，《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竖式通栏大字标语映入眼帘，并用《砸烂甘渭汉的狗头！》这种充满侮辱性的语句作大字标题，发表成都军区机关红色造反纵队的长篇文章，指名攻击当时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的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同时，还刊有一幅丑化军区领导的漫画《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第3版的通栏标题是：《挖掉贺龙埋在成都军区内的黑线》。像这样猛烈，露骨（甚至有些恶毒）地攻击军方领导人的，在小报中也确实比较少见。大概也正由此，成都军区主持的“二月镇反”中，《惊雷》编辑部及相关人员，所受到的镇压打击也最严重。

不过，到了1967年6、7月份，造反派再次崛起，成都军区领导班子因“二月镇反”等问题被中央高层指名批评，并被改组，同时为当初的镇压造反派行动全面认错。形势的变化，让《惊雷》等小报，大有扬眉吐气之感。这时在2月率先拼命攻击军区的《惊雷》，似乎又证明了当时举动之正确，《惊雷》第3期由此成了抢手货，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惊雷》第7期之走俏，则是因为其用了整整两个半版的篇幅，刊载了题为《张西挺同志的揭发控诉》的长文。这是身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的张西挺，于1967年5月29日在四川大学“八二六”召开的“揭发控诉李井泉滔天罪行大会”上的长篇发言，根据纪录整理成文。其中主要是叙述从1950年代起，她和刘结挺与李井泉“长期斗争”的经过以及因此受打击迫害等详情。张西挺这个讲话全文，后来成了四川以及省外众多小报竞相追捧的热门材料，纷纷予以转载或摘登。因此，抢先全文刊载这个讲话的《惊雷》第7期（6月3日出刊），走俏街头，造成《惊雷》编辑部自己也断货，只好向社会示价回收。

《惊雷》编辑部在省城街头公开回收自家小报后没几天，在成都也算小有影响的《炮声隆》等小报，也参加进来凑热闹。

1967年7月12日出刊的《炮声隆》第10号，在其第4版上刊有一则措词简短的《启事》，内容如下：

启 事

为了满足省内外广大读者要系统了解本报的要求，特原价回收《炮声隆》创刊号和第5号各三百份。

回收地点：成都永兴巷招待所《炮声隆》编辑部发行组

《炮声隆》是“东方红11·16战斗团”主办的小报，属于“八二六”派，在成都地区有一定影响和地位。行事风格，在省城小报中，也算得比较活跃那一类。大概受了《惊雷》小报的启示（《惊雷》那份《编辑部启事》，在《炮声隆》上也刊载过），所以也刊登《启事》来回收自己的小报。不过，它要回收“创刊号”300份，恐怕难度比较大。一是“创刊号”出刊时间较久，失散量相对更大，不如近期出的小报存世量多。二是从收藏角度看，“创刊号”价值比普通小报更大，再按出刊时的市价每份2分回收，拥有者自然不会乐意（文革当时，有心搜集保存或专门收藏小报的“爱好者”，已经大有人在）。

《炮声隆》第5期在编辑部回收之列，则是在于所载内容有引人瞩目处。依笔者所见，这期《炮声隆》上的所谓“重头文章”，有以下几篇：一是第1版头条转2版的综述《成都地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是第2版的《我们用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装保卫成都”速写》（“武装保卫成都”是当年成都两派争议很大的一个口号）；三是第4版《谁在制造分裂？——关于5·23、5·24大会及其会刊的内部消息》。此文由“四川日报造反到底《知情者》”供稿，详述两派围绕“5·23”“5·24”大会及其会刊的分歧和争斗情况，颇多内幕披露及可读性。《炮声隆》第5号行情看好，大致在于这些原因。

顺便提一句的是，《炮声隆》这份《启事》上提到的回收地址，在成都市永兴巷招待所的《炮声隆》编辑部发行组。永兴巷是成都闹市区的一条小巷，离最繁华的春熙路不远，但闹中有静。当年这里是西南局的一个内部招待所，有一幢小楼和两幢平房。庐山会议遭难后的彭德怀，文革前的1965年下半年，被毛泽东重新委任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11月下旬离京赴川，就被安排住在这个位于永兴巷7号的招待所内。直到1966年12月底被中央文革授意的北京地质学院及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揪押回北京，差不多1年时间，被发配来川的彭德怀元帅都独居在这招待所的几间平房内，以此为家。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强占强夺成风，看见大街上好的房屋楼层，均可任意进驻霸占，改作自己的“司令部”或办公室等。《炮声隆》编辑部设在这里，大约也是当初强行进驻占据的吧？

9、文革时北京、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

文革小报，是一种特殊的报纸，除了报纸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性功能外，还因其大胆出格的揭露性内容（尤其针对中央高层及省市当权者），以及五花八门的，甚至耸人听闻的猎奇类文章，当然还有那些表达文革思潮和理念的政论性文章，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同时，那些关于重大事件（包括武斗）的赤裸裸的记叙描述，不仅具有情节性、可读性，而且对满足公众的窥视欲和知情权方面，也很

有吸引力和优势。因此，一些文革小报在当时就成了人们追捧搜寻的对象。尤其是对北京及主要省市的知名小报，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各类政治人物）对之兴趣更浓。

然而，从各种小报来说，受地域及种种条件限制，无论其印量多大，发行范围毕竟有限。而且，哪怕同一个省份，同一个城市，小报鼎盛期，其种类形形色色，多不胜数。作为个人，能接触到的，自然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样，对有心人来说，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去换取等价物，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同如开始时的毛泽东像章交换市场一样，文革小报等文革资料的民间交换（或者称作“地下交换”）市场，在文革当时就自发形成，而且很快发展到一定规模。

据了解，全国当时一些主要城市，都有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地下交易市场。而又以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小报交换最具代表性。

北京当时小报交易，主要在长安街西单路口一带。前门附近，则是毛泽东像章的交易市场。相比而言，交换小报的市场没有交换毛泽东像章的市场规模大，人数也相对较少。而且，毛泽东像章的交换者以红卫兵学生和年轻人为主，也有成年人。但交换小报的参与者，则多是成年人，学生模样出入其间者较少。交换方法如同1980年代在国内好些城市街头冒出来的“自由市场”一样，人群围成一圈一圈的，先是交谈，然后展示自己的“藏品”。一般交易原则，是1比1的对等交换。当然，内容好或特别出奇的，也可能一张换两张甚至更多。比如，那期载有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可以1张换4张不同的小报。

曾经参与其事的北京杨志明先生，文革后曾专门撰写过一篇题为《换“小报”》的回忆文章，记叙自己当年在北京街头交换小报的经历，颇多有趣处。杨先生说：

那时小报太多了，你不可能都买全，特别是那些抢手的报纸。为了得到更多的新的更有刺激性的小报，我常常会在发现一种内容抓人的报纸后一下子买十几份，然后再去和别人交换。我去换小报时常背一个破旧的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用来和别人交换的小报。（杨志明《换“小报”》，载《那个年代的我们》上卷第306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

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讲到 he 一次换小报的奇特经历。因为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引起 he 发自内心的共鸣。他曾用4份小报交换了一份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后来，那期《中学文革报》重印，他获得消息赶到北京4中，一下子抢购了十多份。第二天即带上这些报纸打算去西单路口交换。在等公共汽车时，他拿出一份《中学文革报》边读边候车，没料到却被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盯上了。汽车来了，他上车，那人也跟着上车。坐了几站，他下车再转另一路车，那男子也转车。他以为遇到了“便衣”，心慌了。坐了两站，又匆匆下车，没料到那男子也下车一路跟着。正当他想拔腿就跑时，那中年人突然主动向他打招呼说：“小同学，你那份报纸是从哪儿买的？”原来，一场虚惊，对方不过是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因看上了那份载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才一路跟来。后来，

这位中年教师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杨志明引到位于西城区的家中，用他收集的好几份其他小报，换了一份《中学文革报》，双方皆大欢喜，满意而别。

上海文革当年的小报交易市场，据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所述：“1967年第二季度以来，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就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为‘主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再从美术馆到静安寺进行运转，并放射到四周的黄埔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热闹地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下卷第245页）

分散在静安寺，以及与上海美术馆一墙之隔的一条小弄堂等几个地方的小报交易市场，也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开始也是交换像章等，后来发展到交换小报、传单以及其他文革资料，主要光顾者是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借此搞转手买卖，高价出售的投机者，有的甚至公然摆起地摊售卖，颇有几分热闹。

终于，这情况引起了一些“阶级斗争觉悟”高的“革命群众”的不满和愤慨，并投书“揭发”，要求相关方面予以制止和打击。

1967年7月4日，几个月前曾引起毛泽东关注过的上海《体育战报》第18期，在第3版上刊出以《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为题，刊载一封“革命群众来信”，并专门加了“编者按”。来信中说：

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唤，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例如出售一本材料，要搭买一元钱63年的旧报纸，这不是变相的贩卖又是什么？还有个别坏分子转手倒卖，高价出售。例如一本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全集，买进七角，卖出一元，明目张胆地进行投机活动。此风必须立即加以抵制！对投机倒把者必须坚决打击！

这封来信署名“革命群众”，这是文革时期写检举揭发材料的典型做法，不露真名，只写“革命群众”。《体育战报》为发表这封“革命群众来信”，还专门加了一个“编者按”，将此现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反映”。“编者按”称：“最近上海有些地方出现了一股调换文化革命材料的歪风，这与前个阶段调换纪念章的歪风一样，又是一股‘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歪风。从群众来信揭发的情况来看，这次调换材料的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十分痛恨，这完全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对此，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体育战报》发表这封“革命群众来信”及“编者按”后的第二天，上海有关部门在相关地区造反组织和“文攻武卫”人员的配合下，果然采取突击行动，取缔了这些文革小报及材料的地下交易市场，还拘押了一些人。从此，上海的小报及文革资料交换，才真正转入了“地下”，一些人只敢偷偷摸摸私下交换，再

不敢明目张胆在街头公开进行了。不过，没过多久，这些民间交易活动，又呈死灰复燃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有这种需求。

这种民间的交易活动，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文革后期。全国其他大城市情况也与之类似。

【史林一叶】

毛泽东与红卫兵报刊

胡庄子

群众报刊是文革的一个“神话”。

谁都不会想到，在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天空下，群众组织（哪怕只有三两个人）可以创办报刊；更没有想到，1966年9月——1968年底，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创办了数以万计的大量报刊。

群众报刊满天飞的这个“神话”，是毛泽东起的头儿。

1966年8月，毛泽东应北大造反派聂元梓的请求，为北京大学造反派创办的报纸题写刊头：“新北大”。8月22日，《新北大》创刊。这张报纸创刊后的示范作用很强。9月1日，北京“一司”的《红卫兵》和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创刊，这是最早的造反派小报。这些小报创刊后，没有人制止——那就是上面默许了。

毕竟，平头百姓办报，是一件文革前想都不敢想的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一些红卫兵不放心，9月25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有红卫兵问：“自己可以印报吗？”周总理答：“自己印报可以嘛！”

有了这句话，可以放心地甩开膀子干了。在北京红卫兵的影响带动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几乎都办了自己的报刊。一时间，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铅印的、油印的、石印的，呈现出丰富多彩、万马奔腾的局面。

有红卫兵宣称：“无数的红卫兵报，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耀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诞生了！”“革命的红卫兵，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办起革命的红卫兵报！让我们的报纸，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革命的红卫兵报好得很！革命的红卫兵报万岁！”（《欢呼革命的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报第12号，1966年11月20日）有造反派自豪地说：“我们正在进行着人类有文化以来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由我们工农兵革命文艺战士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印、自己发行、自己看的刊物，就要送到我们掌大锤、舞镰刀、握枪杆的工农兵手心里来了！”（《红雨花》发刊词）

这些报刊也被送到毛泽东的身边。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回忆：“随着种种红卫兵群众组织的相继成立，种种红卫兵群众组织创办的种种报刊也纷纷出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对红

卫兵群众组织创办的报纸，毛泽东也常常翻看，有的边看还边用红铅笔圈画。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赠送给毛泽东的报纸和刊物。有的毛泽东翻看了一下，有的根本没有拆封，连同看过的报刊一起退给我们保管。我们估算了一下，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身边的各种报刊，除了我们根据毛泽东的需要订阅的百种以上之外，加上各地出版部门、红卫兵群众组织赠送的，一共要有近300种。……60年代中期以后，他老人家看后的报刊和他看不看的报刊，都即时退给我们保管存放。这里我特别说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送给毛泽东的报刊，大报小报，大刊小刊，专刊、号外等等，至少也有百种以上。这些报刊，毛泽东看过的是少数，大多数没有拆封过。”

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关注，成为毛泽东了解各地文革进展情况和派性斗争情况的重要渠道之一。张春桥说：毛主席每天读一大叠报纸和传单，再三嘱咐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时读报。1967年8月3日，林彪接见杨得志时说：红卫兵的报纸，主席都亲自看。（《文革通讯》第88期，上海红反会1967年9月1日编印）

我收集到的文革期间毛泽东阅读和评说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话语不少——毛泽东说：“红卫兵写的东西好看，《人民日报》不好看。”

1967年1月，毛泽东在“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上看到《打倒“私”字，实行革命的造反派大联合》一文。他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并要身边人查查作者是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这篇文章被“两报一刊”转载，作者孟繁华也被调进《人民日报》。

1967年6月，毛泽东接见东南亚一共产党领导人时说：仅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销量就在10万份以上。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看到两百多种，看不完。如将全中国的报纸销量加起来，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量总数还多。

7月，毛泽东对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进行视察的前一天，与从湖南来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了湖南形势。周十分惊讶毛非常了解长沙武斗情况。毛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毛泽东在江西视察时，多次提到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主办的《火线战报》。

8月27日，毛泽东说：“天津南开《卫东》红卫兵小报有一篇好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毛泽东指的是《卫东》上刊登的《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

10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时说：“为了争夺报纸，争夺舆论机关，斗争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报》，这一派夺了过去，那一派再夺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赞成，根本不出版，那么就出很多小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大的学校，都有报纸。”

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的讲话中说：“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

……往事都已成烟。

我关注的是，毛泽东阅读过的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的报刊，今在何处？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回忆：“从1973年到1975年，我们曾经对这部分报刊进行过整理，凡是毛泽东阅画过的报刊，我们逐一登记，妥加保管。其余的按6大行政区，分省、市，按地区进行分类、整理。因为数量比较多，还有其他重要的日常工作，所以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报刊，毛泽东处应当是最齐全的。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最珍贵的资料。我们一定要好好整理、好好保管好。我们决心进行整理、装订。事情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毛泽东逝世后，中南海毛泽东书库（增福堂、永福堂、来福堂）三个大院的存书要全部搬动，毛泽东的图书要全部摆放到丰泽园故居。我记得，有关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报刊，也一起搬放到丰泽园松寿斋小院南厢房最西头的卫生间里，大小大小一共有100多捆。从此我们对这部分报刊的整理工作就停止了。不久因工作需要，这部分报刊占用的房子要腾空，当然这部分报刊就又要另择地方了。报经中央、中办领导同志同意，这部分报刊就交给当时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图书馆（在沙滩北街2号）了。后来，这部分报刊的存放、处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404—405页）

徐中远1966年～1976年做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是毛泽东晚年的读书情况记录者、目击者。他撰写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1版1印）提供了大量的毛泽东读书的第一手材料，爱书藏书的人、研究毛泽东的人不可不读。书中提到的毛泽东阅读红卫兵报刊的情况、毛泽东处的红卫兵报刊的收藏、整理、归属等问题，是不为“宫”外之人所了解的，因此史料珍贵。

笔者读了徐中远的文字，有欣喜：有关部门曾对毛泽东处的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报刊进行了初步的整理，起码应该有一个简单的目录。如果当事人不弄丢的话，这个目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多的是担忧：这部分红卫兵报刊，“100多捆”，交给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图书馆”之后的命运怎样了？

鲁迅说过：“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传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我的担忧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了，他们会不会把这“100多捆”东西当废品卖了……

看来，我得常去潘家园看看……

【史林一叶】

文革中湖南（长沙）的民间报刊

陈益南

文革中，特别是1967年造反浪潮高峰期间，民间报刊骤然产生并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5000余种民间小报，遍布神州。这些报刊的影响，不仅深入社会，甚至上达天庭。

这里所说的小报，都是铅字印刷版，还不包括那些数量更多的钢板刻字油印的各类小报。

1967年7月初，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民主人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好友）应召，到北京见毛泽东。会见时，周发现毛泽东对湖南当时文革情况，包括刚刚发生不久的长沙中苏友好馆“六六惨案”武斗事件，竟非常熟悉，甚至还能谈及湖南两派在长沙市东塘、河西等处的武斗情况。周对此非常惊异。毛则告知：他经常看地方上群众组织的小报。毛还指着他的办公桌上堆着的一些报纸，说这些都是湖南来的小报。

可见，当时民间小报的影响程度。

文革中所谓民间小报，都是自发而兴起的各地各类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组织所创办的报纸、专刊。湖南省在文革中，自然也产生了不少这样的报刊，特别是1967年7、8月间，在省会长沙城内的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向社会广泛销售或送发这类报纸的情形。只是，当时在湖南全省究竟出版与发行了多少民间报刊？现在还没有全面资料可以统计。

文革中的民间小报，包括当时湖南的小报在内，与现代报刊的标准——即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并还能具有监督政府功能的情况，自然是有些不相同的。

以湖南（长沙）的民间小报为例，可大致了解到如下一些特点。

（一）从政治上讲，这些民间小报虽然也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但却大部分都是群众组织的“派报”“机关报”，即是派性之报。它并不具有完全客观的立场，而是只为创办它的组织服务，其宣传性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些报纸中的内容，除了揭露批判省委市委的“走资派”（就是在地方执掌大权的一些领导干部）的种种问题之外，大多便是宣传本组织的观点、攻击对立派别的文章。

例如，长沙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所创办的《工联战报》，在它于1967年6月29日出版的第9期报纸中，刊发了攻击对立派“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长文《高司一小撮暴徒武斗罪行录》。而“高司”方面的《红卫兵》报，则在6月24日出版的第32期中刊发长文，控诉：“工联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六号门、青年近卫军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杀害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不过，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即便是在民主体制中，报纸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完全客观的立场，它们一般也都会是创办者的声音，或重在本党派观点的张扬，或持有某种倾向性立场观点。执政党的喉舌，往往多粉饰政绩，而在野党反对党的报刊，则极力以揭露现实问题为己任，批评政府与执政党。

因此，文革中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类报纸，即便是“派报”，从报纸功能的某些角度看，也不算出格。

再者，更重要的是，若是评价报纸的出版环境，则更不在于它刊登了些什么内容，而在于它们是不是民众自由创办、出版的，而不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作为。

从这个标准说，文革的小报，的确是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新闻出版自由。

当然，文革中这个短暂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有限的自由。即虽然可以批判省、地、县的各级干部甚至中央的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但绝对不允许批评整体的中国共产党，不允许批评党的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不允许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否则，将以“反革命”治罪。此外，当时公布的法律性规定“公安六条”中，在公民中划出了所谓“21种人”，严厉禁止他们参加文革运动，极明确地剥夺了部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包括这种出版自由的权利。

当时民间小报的主办者，一般都不会去触犯“公安六条”中的禁令，不会去批评毛泽东与党中央。不过，一方面，当时民众的观念，因长期所受的宣传洗脑，故对此基本没有抵触，并能接受。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浪潮的得以兴起，的确是因民众对前十七年中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强烈不满，才能与毛泽东的文革构想合拍。因此，当时那种能批评任何地方官僚的出版自由，便已让民众较为满足了。

1966年下半年间，湖南就产生了最早的保守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八一兵团”等，他们有没有办报？对此，没有什么印象了。当时，造反派肯定也还没有报纸，那时双方的纸媒宣传，主要是大字报与传单。

湖南保守派，一是因其成员中党、团员多，集中度高，都集合于若干大组织之中，故而组织数量较少，所办报刊也不多。二则是因文革造反高潮的1967年中，湖南保守派得势时间不长，因此，其所办的报刊，没有多少发展时机。

而后来以“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代表的“新保守组织”，出版报纸却非常早（大约在1966年10月，他们就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也办得很正规，比较有影响。“高司”总部及其下属全部8所大学总部的报纸是：总部的《红卫兵》报、湖南财贸学院的《东方红战报》、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报、中南矿冶学院的《文革战报》、湖南师范学院的《云水怒》报、湖南农学院的《延安战报》等。还有长沙铁道学院、湖南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三所大学的“高司”派红卫兵组织，也都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报纸，只是其报的名称，笔者不记得了。

造反派组织首次出版报纸，是在1967年3月以后的事，那个时候，造反派借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机，掀起又一次造反高潮，这时，强化了对舆论宣传方面的力度，因而不仅仅用传单、广播，也开始使用报纸的形式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小报，便得以流行。

当时，在长沙造反派组织方面出版的小报主要有《工联战报》（“长沙工联”总部）、《长沙工人》（“长沙工人”总部）、《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红色新闻兵》（湖南日报社“红色新闻兵总队”）、《永向东》（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高校风雷》（高校风雷挺进纵队）、《湘江红浪》（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星火燎原》（井冈山红卫兵）、《红中会》（长沙“红中会”）、《近卫军报》（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红旗》（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等。此外，还

有更多种类的小报，因其造反组织小，影响不大，但经常林林总总被张贴在街头、或免费向过路民众散发、或被送往相关造反组织的“宣传部”，扩大影响。例如，由中学界教师职工的造反组织“中教联”创办的《中教联》报、“南区九二四黑鬼战团”所办的《黑鬼战报》、湖南电业系统造反组织“红电军”的《红电军》报、临时工造反组织“红工会”的《造反公社》报、长沙知青造反组织的《红一线》、《革命青年》报，等等。

由于报纸多用于“派战”，所以，当时的民间小报，其报刊很多是以某个组织的名称，作为报刊的名称，从而读者一看报刊名称，便知道这报是由谁办的，是什么样的办报方针、观点，而不是像现代报刊那样，名称能多姿多彩，不细读之中的文章，是猜不出这报刊有些什么立场的。

（二）也有少数民间报刊，不是某个组织的“机关报”，而只是为某一个具体问题而专门创办的。

例如，有一份《湘中专案简报》，是由“首都红代会”到湖南来的一些红卫兵及相关人士联合创办出版的，其报纸的宗旨及内容，便全是为原湖南中共地下党的一支武装“湘中纠察总队”申冤，因为这支武装在1949年后被打成“土匪”队伍，文革中相关人员便在上访的同时，出版了这份报纸，作为强力代言，公布调查情况与要求平反的呼吁。报纸办了几期，其内容很少涉及当时的派性之争。

还有一份《咆哮》报，也是由一些文革前挨了整的原中共地下党老干部与相关民主人士主办，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 湘江战团》，以一些造反组织做后盾支持，出版了这份报。这份报的内容，虽然也有小量抨击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的文章，但重点版面都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冤屈申诉，包括对原省委负责人若干问题的揭发批判。

湖南日报社一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编辑、记者，在文革中也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不过他们这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基本不涉及社会上的造反活动，只是为他们被打成右派的问题申冤。这个组织也出版了一份报纸，名称似乎是叫《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专刊》，出了三期，后来因湖南“省无联”案牵连，该组织被打成“省无联”的“反动”社会基础，被湖南日报社内的正统造反派组织“红色新闻兵”予以摧垮，报纸自然也没有了。

（三）文革中的湖南，造反派组织还出版过一份内部参考性质的报纸《湖南简讯》，其版式为与众不同的十六开八版。它于1967年6月中旬开始出版，一直出到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出了80多期（约每周出二期）。这份报纸是当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造反组织“红色出版兵”负责，邀集“长沙工联”、省委机关“永向东造反团”、“红中会”、湖南日报社和长沙晚报社“红色新闻兵”等十多个较有影响的造反组织联合主办的，实际编印出版发行工作，则由“红色出版兵”主持。

这份报纸要付费订购，每份2分钱，不公开发售，而采用预订方式。由需要订阅的造反组织，或集中由“长沙工联”统一收费、预订、分发，或由欲订阅的组织直接与《湖南简讯》编辑部联系订阅。

《湖南简讯》是一份湖南文革中出版的重要报纸，虽是小报，但其历史信息量很大，几乎全方位反映了1967年6月至1968年4月造反高潮期间，湖南文革的主要事件之概况、脉络。对于今天及以后人们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湖南文革历史，能有较大的帮助。

（四）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造反组织“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其出版的该组织“机关报”《红色出版兵》报，原本是八开四版报，但在1967年9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却创造了一个纪录：出了32版。

一份报纸出了32个版，这在广告铺遍报纸版面的今天，不算稀奇，但在普遍只有四版报纸的年代，特别是在1967年，自然是件很出格的事。而且，这个32版，全是历史记录，而无任何广告类版面！

为什么这一期报出了32个版呢？

因为，这个第九期刊登的是一个专刊：《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大事记（草稿）》。

其内容是从1966年3月至1967年8月期间，湖南（长沙）文革历史的重大事件逐日记录。它包括文革初湖南省委如何组织批“三家村”、如何计划“清理4万教师”、如何布置抓“新右派”，直至几大造反组织如何成立、如何造省委、造省军区的反、发生了些什么样的武斗等情况。

这份《红色出版兵》第九期报纸版面之多，也许是全国文革小报的一个特例。而它刊登的内容，则有编年史的味道。凭此二点，对报刊收藏者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都不可不予关注。

（五）民间小报的版式，一般都是八开四版。

但，也有些例外的版式。如上述湖南日报社一些“右派”人员办的《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专刊》报，前二期便是采用了对开六版。版面之大，很是独特，张贴在墙上，格外令人注目。

上述《湖南简讯》，则是更特殊的十六开八版的版式，从版式上就体现其内参性质。

不过，整体上对开、十六开版式的小报，都很少见，而多是八开四版。

报纸印刷，基本只有一种油墨颜色，即黑色。不论报名，还是标题、正文，均多为黑色。

也有个别报名用红色的，如1967年9月27日出版的《湘江风雷》报红八期（当时一些组织为了强调自己的“红”，将“第几期”有意改成“红几期”或“红几号”，以示与旧式报纸的区别），“湘江风雷”四个字，就是套红印刷。而湖南日报社的《红色新闻兵》，则一直全用了套色，报名也固定是红色，有时要显示文章的重要，标题也会用红色。

（六）“日报”形式的小报，则是绝对没有。

据笔者所知，不仅湖南没有过群众组织办的“日报”，当时在全国、包括北京那些赫赫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办过。最多是出版周报，旬报。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七）民间小报的创办与维持经费，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政府的财政开支。

由于当时结社创立组织、搞“司令部”什么的，已基本自由，只要能集合一批人，任何人都能或找政府专门主管机构——当时是省、市委的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办公室，或后来接管本地区文革领导权的军区相关部门，或找本单位、本系统的党政领导机关，要求成立群众性“革命组织”，这种要求基本都能获得批准，并且，在获批成立“革命组织”的同时，还会获批一些组织活动经费。这些经费中的“宣传费”，就可用来创办报刊。

甚至，上述湖南日报社一批“右派”人员组织要求平反的造反活动，也一度获得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认可，于1967年9月底批给了他们办报的经费。

因此，文革中湖南（长沙）一切群众组织，不论造反的，还是保守的，他们创办的报刊，其经费来源，全来自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拨款，而没有哪一份报纸的经费是来源于个人或企业团体的集资、投资。

在报纸编印过程中，有时也发生过由组织中的个人临时凑钱作为经费的情况。但那并不是表示是个人出资办报，因为，那些临时凑的资金，都会或在报纸经费正式拨下来后归还给个人，或是报纸有收入了再归还给个人，毕竟，这种个人凑钱，只属于临时“先行借用”的性质，而不是投资入股。

不过，这种省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拨款，不是政府的主动，而带有某种被迫性质（上面有中央对群众造反的支持，下面有来自造反群众的压力），不能也不敢不拨款。因此，文革中办报的经费，虽也来自于政府，但却并不表示这报纸是政府的喉舌。

由于报纸出版发行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拨款，因此，报纸的主办者也没有经营报纸的理念，不会考虑赢利，也没有任何赚钱的要求。一般也没有发生钱用完、不能再出版了的情况，除非报纸的主办组织不打算再出版该报。此外，当时出版的小报，大多是不定期出版，几个月、一年下来，也出不了几期。那些势力强大的群众组织所出版的报纸，比较正规，才能一周、或十天出一期，连续出版。当然，他们因为是大组织，所申请或所获得的办报资金也较多，不须担心没有印刷费。

有些组织出版的小报，也定价公开出售（如《近卫军报》是2分钱一份），这种情况下，报纸的经办人会有些收入。这些收入，一般是要回缴主办组织相关部门的。但有时部分出售的报纸，往往只是报纸的小部分，收入并不多（卖二千份报，也不过收入20元钱），则一般不会回收进入再出版的资金中，据说，有的做了相关经办人员的生活津贴（做清凉饮料费、误餐费之类），也有的最后上交了。

2012/08/19

【蓦然回首】

文革中一家独具特色的油印小报

黄肇炎

文革时，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下简作重大八一五）旗下有一份颇具特色的小报——《指点江山》。这份小报有不少特点：首先，它主要登载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其次是活跃——出刊的频率高，一两天、三五天就出一期；第三是及时，当天发生的事件，刚刚得到的消息，马上就可以印上小报，予以传播；四是信息广泛，上自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下到街谈巷议，大如全国各地的要闻，小及本市本校的动态，内幕传闻，小道消息，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五是注重保持原意，外来资料（包括对立面的）除因篇幅原因作必要的删节外，基本上是原文照发，不进行改动；最后，它存在的时间长，期数多，大约出过 300 期。据当事人回忆，仅 1968 年“三一五指示”以后，至少就编印过 100 期。

当时，重大八一五办有好几家报刊。其中最重要的是《815 战报》，这是战斗团的机关报，是发表正式言论、观点、主张的“主流”报。《横眉》，是专门以低姿态骂人，所谓打派仗“战斗力强”的小报。打击目标主要是省革筹的刘、张两挺，以及重庆的反到底派。《打倒李井泉》专刊，是“坚持和掌握大方向”的小报，矛头针对李、廖、任等走资派。此外还编印有一些资料性的小册子，如《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上流传的未正式发表的毛文章、讲话）、《中央首长讲话》（包括一些文件）和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资料等。而《指点江山》以其丰富、高效、灵活、客观的特色，受到大家的喜爱，在战斗团内被戏称为八一五的《参考消息》。

《指点江山》是油印的，囿于蜡纸的原因，它印成 16 开两版（8 开纸一张）。内容多的时候，就多刻印几张蜡纸，即增加版数来解决。印在打字纸（不是现在的复印纸）上，那时的纸比较薄，有点半透明，所以只能印单面。版面虽小，容量却很大。一期报上多的有十几二十条消息、动态。最短的一条消息只有一句话，20 来字。新魏体的字，刻得小，印得密密麻麻的。

《指点江山》的兴办，是在 1967 年 4 月。当时重大八一五总团越来越感到情报工作不足，有点闭目塞听的感觉，为解决这个问题，便考虑成立一家收集各方面信息的机构。同时要把这些信息及时地发布出去，这就需要编印一份小报。于是由机械系 68 级学生朱宗文牵头，招揽人马，拉起了队伍。经多方筹备，在 1967 年 4 月 27 日编印了第一期报纸。为纪念这一天，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试刊时的报纸就叫《四二七战报》。编辑部也就叫四二七部队（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误解，因次年有个对八一五派有利的中央首长“四二七讲话”，不了解的人会以为与之有关，其实只是巧合），对外基本上都是以四二七部队的名义，很少称编辑部。后来，小报才改用了正式的名称——《指点江山》。收集信息，编印这张小报，就是四二七部队的全部活动。

成立后的队长是朱宗文。朱为《指点江山》的创办，费了不少脑筋，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前述报纸的方向和特点，都是在他手中确定、形成、坚持下来的。他多次讲，是受总团的指令来建立这支队伍，办这张报纸的。意思是说四二七部

队在八一五战斗团内是名正言顺、正二八经的机构，以此来鼓动人心和提升士气。在以后的工作中，四二七部队与总团的联系，总团对他们的指示，都由朱上传下达。

四二七部队，是一个跨系跨班的小机构，最多的时候正式人员有近 40 人，其中还有几个重大八一五的女教师。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人员大多是朱宗文拉来的，所以成员以机 68 级为主。有一个刻蜡版的杜开坦（机 68），后来成了云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刻蜡版的还有一个李美成（机 68），



后来是云南省技术监督局质量检测所所长。朱原是机械系 67 级学生，是留级到 68 级的。所以他原来班上的杨石林（机 67）也动员来了，负责内勤管理。杨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文山县农机厂，后来当过该县县长、文山州政府秘书长、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常务副主任（正厅级）。还有詹廷珊（机 67），在队里负责信息汇总和情报分析，后来是昆明灯泡厂的总工程师。

（上图：当年的朱宗文〔右〕，杨石林。）

1968 年 3 月初，正好是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三一五指示”前，不知怎么的，总团有的勤务员对朱宗文不太满意。传出来的消息说他“能力不行……”，“既不能写，又不会刻（蜡版）……”。于是，另派了无线电系 67 级的李闯（原名李志君）来当队长。朱宗文就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付出近一年心血，已取得成绩的《指点江山》。原来跟着朱的几个骨干和一些人也陆续退出了。李闯随即招兵买马，新增加了不少人。李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昆明物理研究所工作，后调走。

这样，《指点江山》基本上以“三一五指示”为界，前期是“朱宗文时代”，后期是“李闯时代”。除前述共同特点外，他们二人办报的理念有些小差异。朱是只刊登收集来的各种信息，不发表表达自己观点、意见的文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留文字依据，避免秋后算账。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是报纸，就应该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针对那些重大事件。于是对中央“三一五指示”和后来的“四二七讲话”、重庆市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重大事件，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表态性、评论性的文章。

李闯来后，与总团的关系更密切，新添了先进的设备（滚筒油印机），经费上也更宽裕。他也确实能干，既能搞编写，还刻得一手漂亮蜡版字。

四二七部队设在学生一舍一楼（层）。进入一舍大门，右手走廊两边十多间宿舍原来空着，这就成了他们的队部。布置有办公室、编辑室、刻印室、资料室、储藏室等。还安排有内勤人员的宿舍，住着部分人员。我同级同专业的詹廷珊晚上要接电话，抄录各地报来的信息，所以就住在这里。还为前来报告情况，天晚

回不去的中学生，准备有招待房间，布置了不少的床位。

四二七部队人员的分工主要是内勤和外勤。

外勤就是驻外收集信息情报，有十多人，重庆的八区三区都派有外勤，当时不叫记者。他们一般住在当地的中学里。以他们为核心，发展有联络员。每个外勤手下都有十多个联络员，基本上都是中学生。那时重大八一五名气响，号召力强。能够为其办事是很荣耀的，所以这些联络员大多很卖力。外勤可以报销交通费，也就是公共电汽车票，交队部集中后到总团报销。后来还给有的外勤买了月票。

内勤的工作是编辑、刻蜡版、油印、分发等。编辑是对收集来的原始信息进行整理加工，使之通顺简练，符合书面文字要求。有的信息经过分析，认为涉及到一些机密问题，比较重要，属于情报之类的，就由队长直接上交总团勤务员。每期的印数都有好几百份，看蜡纸的耐用度定。

《指点江山》印出来后，大多数上交总团，由总团办公室分发给战斗团内各单位、部门。同时，还连同其他小报、资料给市内和全国各地友好的造反派组织邮寄。当时交换小报是造反派的一大风景，总团每天都能收到数十家单位寄来的小报等资料。其余的部分报纸由外勤带回去，给那些联络员四处分发。新报纸出来后，还在校内大字报栏的几个地点张贴。时间长了，这几处地方基本上成了《指点江山》相对固定的张贴栏。



（上图：《指点江山》结束时，“四二七部队”部分成员的分别照。后排左一詹廷珊，左二李闯〔志君〕。）

笔者当时是《815战报》的编辑，与《指点江山》有一定的工作联系。加之经常来找杨石林吹牛，所以来四二七部队的次数较多。文革前，学生会在校内生活服务网点饶家院的大门外办有一个《卫生专刊》（有橱窗的定期壁报）。杨是主编，我是他手下的编辑，所以关系密切。我每次来四二七部队，都见他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着，人员急匆匆地进出，编写的、刻蜡板的、油印的、分页的，忙得不亦乐乎。文革时，造反派的群众是靠一种革命的信念凝聚起来的，干工作都是积极、认真、努力的，有较强的事业心。四二七部队由于报纸受人欢迎，工作成绩出色，受到总团的赞许和重视，渐渐名声在外，成了一个众人瞩目的单位。

随着运动的进展，人们对文革的热情普遍开始消退，逐渐把注意力转到生活、文艺等其他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文革的厌倦，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后来，四二七部队除了编印报纸外，还印了不少的其他东西，例如菜谱、歌曲集等。其油印质量相当精美，厚本厚本的歌曲集一印就是几百本。

由于《指点江山》主要侧重于资料、信息，对派性相对中立，在“三一五指示”及以后的政治风浪中受到的冲击不大。加上李闯带领大家埋头苦干，长期坚持，所以报纸存在的时间相当长。1968年8月27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重大，全面掌握了学校的大权，校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不久，八一五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奉命停止活动，原来办的《815战报》等都停刊了。工宣队另行主办了《新重大》报。但四二七部队还在活动，还在编印着报纸。一直到1968年底，66、67、68三个年级毕业分配完毕，学生即将离校。面临着人员星离云散，《指点江山》才最后终结了。

作者简介：

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重庆合川。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文革中曾任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毕业后长期在云南省的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后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副院长。

【故纸堆】

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红卫兵“战果”

王 锐 提供

提供者说明：文革初期1966年8、9月份，被狂热煽动的红卫兵“抄家”等恶行，到底有多少“战果”，至今各文革专著中均未有较全面的数据，多是引用某地一些零星数据以概述之。近日翻检文革“故纸堆”，发现一份题为《红卫兵的巨大战果及其伟大功绩》的传单，引用的据称是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全国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战果”。统计截止日是1966年10月3日。笔者仔细审视一番，认为具有一定可信度，公布在这里供史家学者参考。

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所公布的“抄家行动”中所“抄没财产”数据，除上百万两黄金和数十万两白银以及上千万的外币外，所抄没的“现款、存款、公债”，高达48126亿人民币！如果这辗转传抄翻印的传单引用的数字无误，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76页记载，1967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2104.5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70.5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12.2亿”，“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0.17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419.4亿元”。与这些数据相比，48126亿元人民币，是很大一个数字，它相当于当时全中国20多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当时国家100年的财政总收入！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其他物件”，仅文物古物就一亿多件，“价值超过以上总值的几倍到几十倍”！这些都是红卫兵从民众那里公开掠夺的。而且，这还仅仅是各大城市统计数，还不包括全国中小城市。由此看，当局也确实确实发了一笔红卫兵“抄家财”。所以，要拿到最高级别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当做“功绩”宣布。

红卫兵的巨大战果及其伟大功绩

据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全国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贡献，让我们高呼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红卫兵万岁！

十月三日前

（一）挖出暗藏敌人：

- 1、地、富、反、坏、右，16623 名。
- 2、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 件。
- 3、其他刑事案，3368 件。
- 4、发现大量反革命线索。

（二）缴获枪枝弹药反革命凶器：

炮，66 门，土炮 65 门，机关枪 122 挺，土枪 18800 支。
炮弹、手榴弹 26700 个，子弹 136400 发。
炸药 210000 斤，雷管 389000 支。
战刀、匕首 230800 把，反动证件 1858000 件。
毒药 600 斤，变天帐、房地契 1110000 册。
反动旗帜，蒋匪相片张（面）。——原文如此，无具体数字。
反动黄色书籍，52450000 册，大烟土 30400 斤。

（三）没收财产：

黄金 1198000 两，白银 306000 两。
美钞 3558000 元，银元 9789000 元。
英镑及其他外币 3739000 元，绸缎布匹 955000 尺。
现款，存款，公债等，4812600000000 元。
还有其他物件大批，古物一亿多件——价值超过以上总值的几倍到几十倍。
原县（陕西）有一块地方挖出冲锋枪 14 支，有一位挖粪工人在地里挖出黄金数百两。

（四）从城市中赶出一批牛鬼蛇神。

从全国城市中赶出四类分子 141700 名。
资本家户主 111000 名，其他牛鬼蛇神 62300 名。
上述人员随迁家属 182300 名。

（五）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和伟大功绩：

- 1、现在全国到处学习毛主席著作呈现一片新气象。
- 2、挖出一批潜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据北京四个区统计搜出 475 名，其它中 432 名长期隐名，枪 108 支。
- 3、资产阶级威风扫地。
- 4、破除了宗教迷信。

- 5、没收了一批资本家不义之财。
- 6、打击了流氓阿飞，清除了社会渣滓。
- 7、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帝反修斗争。
- 8、改革了旧风俗，旧习惯，发扬了社会新风尚。
- 9、造就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技术工人学校毛泽东思想《造反有理》兵团翻印
上海市国棉十五厂《反到底》青年战斗队转抄
上海市手工业局机关3 2 1 1 1战斗队翻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故纸堆】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二·二五”批示有关文件

韩平藻 提供

按：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仅各地党政机关相继瘫痪，连中共中央也实际处于瘫痪状态，这时的“中央”，实际上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少几个人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不得不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直接面对基层民众，因此，即使注明了“发至县、团级”的文件，也常常会传达到普通老百姓当中。当时的国务院接待站、中央文革接待站和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都将一些中央文件大量印发供群众学习掌握，许多群众组织也将一些中央文件加以翻印、转抄。直到1968年底各地革命委员会陆续建立，群众组织相继撤销，特别是1969年中共“九大”建立起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后，中央文件的发放和流传才重新受到了严格的等级控制。因此，1969年之后的一些曾传达到基层、家喻户晓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后来再难找到原文。

1969年底对四川的文革运动起到极大转折作用的中央“一二·二五”批示，曾在四川城乡大张旗鼓传达、宣传，后来却很难见到原文，甚至无人能说清楚这个批示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也只收录有一个几百字的《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概要）》。不过，本刊最近却得到了读者提供的“一二·二五”批示两个文件的手抄件。手抄中央文件，在当年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宣传、教育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已使许多人养成了对中央文件逐字逐句学习领会推敲研究的习惯，所以不少人会不辞辛苦地手抄文件。这种手抄件即使可能因转抄出现个别文字错讹，但基本能保存文件的全貌。

当年中央“一二·二五”批示的相关文件应该有三个，还有一个《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估计或因其只发至四川省的地、师级而未被抄

录者看到，或因该文件是谈三线建设问题而无政治斗争内容，所以抄录者没有抄录。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9〕8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
《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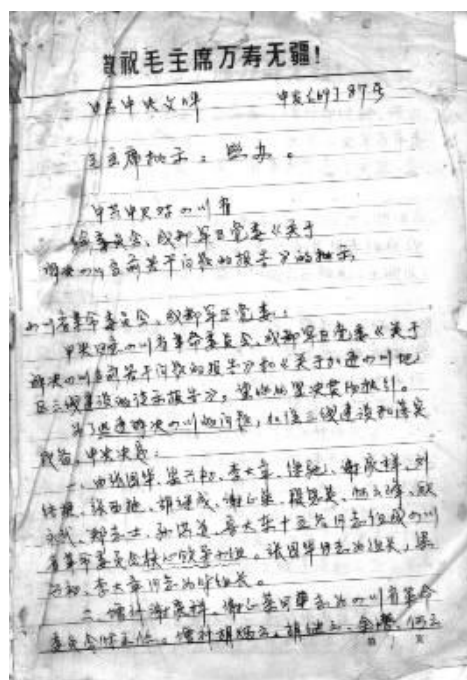
（一）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谢家祥、刘结挺、张西挺、胡继成、谢正荣、段思英、何云峰、顾永武、郑志士、孙洪道、鲁大东十五名同志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同志为副组长。

（二）增补谢家祥、谢正荣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胡炳云、胡继成、余潜、何云峰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增补邓经纬、顾永武同志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免去王英军省革委常委、梁善计省革委委员。省革委常委蓝亦农、委员韦统泰已调外省工作。

（三）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九名同志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梁兴初同志为组长，王诚汉、谢家祥同志为副组长。

（四）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唐兴盛、何辉燕、李华安、蒋崇璟、鲁大东、顾秀、钱敏、丁钊、丁先国、冀绍凯十七名同志组成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同志为副组长。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狠抓对敌斗争，狠抓斗、



批、改，狠抓战备动员，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和战备工作，迅速把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促上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四川很有希望。”中央相信，四川广大军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定能够把四川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可靠的战略基地。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批示和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报告发到四川省县、团级；关于三线建设报告发到四川省地、师级；以上三件发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及部队的军级。）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9〕88号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 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为了解决四川当前存在的问题，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和驻川部队、省军区、军分区及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从11月5日至12月24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向中央汇报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在中央直接主持下，我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九大”文献。中央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我们开会，耐心地教育我们，提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我们教育鼓舞很大。我们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加强战备，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

四川广大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夺了党内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逐步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在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大军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提高，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从“九大”以后全国的形势和当前战备工作的要求来看，四川的革命和生产是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在省革委的领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犯了以下的严重错误：

（一）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按毛主席思想和指示办事。我们对毛主席的一系列

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和《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敌情观念不强，没有狠抓对敌斗争，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没有发动群众认真清理，对现行反革命活动打击不力，对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没有认真批判。

（二）我们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违反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发布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我们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一碗水端平”的指示，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省革委领导人错误地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与“反红十条”派，这就使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武斗不息，干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三）我们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所谓“反复旧”运动，在省革委第二次全委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错误的决议，发表了《四川日报》编辑部《击溃“二月逆流”的历史经验》等错误文章，提出了《整党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错误作法。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各级革命委员会，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干扰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个别领导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大搞“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利用各种宣传、文艺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散布许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干了不少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

（五）领导核心不团结。省革命委员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长期互不信任，互不支持，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特别是对个别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严肃的斗争，有不同意见不是摆到桌面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而是各行其是。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一元化领导，影响了军队内部、军政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当前全国军民正在加强团结，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四川是三线建设的战略基地，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四川寄予很大希望。为了迅速纠正我们的严重错误，认真搞好革命和生产建设，落实战备工作，迎头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特提出以下十一条措施：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各级领导班子要带头学，带头用，自觉地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指示都必须按规定及时传达，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二）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增强党的观念。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都要

增强党性，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要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挥一元化集体领导的作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建议中央批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名单。

（三）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要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各地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现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迅速实现归口革命大联合，所谓“善后组”、“联络站”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等一律撤销。不准另立山头，重拉队伍，今后一律不准用“兵团”、“八二六”、“反到底”、“红成”、“八一五”以及类似这两派群众组织的名称发表讲话、文件，进行一切活动。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切资产阶级派性，“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

现有“三代会”必须服从同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不设立脱产的办事机构，上下不发生垂直的领导关系，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暂不建立“三代会”。

（四）巩固、完善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自身的革命化建设。一切革命同志都要尊重、支持、帮助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三结合还不够完善的地方和单位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补台，不准拆台，更不准推倒重来。现在已存在二个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经过平等协商组成统一的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要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组织革命化，保证我们的政权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手里。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执行。

省、市、地、县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机构要精简，工作人员应由军队和地方革命干部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地区文革组、机关文革组、革委会审批组、定案审批组等都应撤销。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有群众代表都不能脱产，其中青年知识分子要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五）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坚决执行中央“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收缴一切武器，解散一切形式的武斗队。对于继续挑动武斗，破坏社会治安，破坏交通运输，煽动、胁迫职工、农民离开生产或工作岗位，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利用宗教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认真作好解放干部的工作。“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不能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以站在哪一派作为解放干部的标准。对革命干部要信任、支持，大胆使

用，发挥他们的作用。

（七）要拥政爱民、拥军爱民，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认清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支柱，积极帮助和支持人民解放军做好战备工作和“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习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优良传统，警惕阶级敌人破坏军政、军民团结。

军队团级以上单位要建立和健全各级支左领导班子，加强“三支”“两军”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支持和维护革命委员会，热爱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 8341 部队的先进经验，对两派群众坚持“三条原则”，做到“一碗水端平”。

（八）加快斗、批、改的步伐。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之流，肃清他们的流毒。进一步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一步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要抓紧清理阶级队伍，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反对以资产阶级派性立场只清不同观点的敌人，包庇相同观点的坏人。对混进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发动群众进行清理。

各地方、各单位要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方针和新党章抓紧整党建党工作，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和新党章的教育，坚决反对以资产阶级派性观点“吐故纳新”。

（九）加强宣传工作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舆论阵地。报刊、广播、出版、文艺、电影等部门，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派出得力干部彻底改组四川日报社，彻底清理宣传、文艺部门的队伍，这些单位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搞好斗、批、改。所有群众组织的小报、刊物、有线广播等一律撤销。

（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狠抓战备落实，搞好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特别要改变农业落后状态。用战备的观点来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立即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加快进行三线建设。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国防，保卫祖国，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增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光。

（十一）为了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总结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我们请求中央为四川举办一期五千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中共成都军区党委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省发至县、团级，其它发至省、军级。

【故纸堆】

中央首长 1969 年 10 月 19 日凌晨 接见贵州汇报团时的指示

萧世敏 提供

按：此件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一居民保存的传达记录手抄件录入。在 1967、1968 年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支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贵州省革委控制的报刊、广播电台曾大力宣传刘、张夫妇与李井泉“英勇斗争”的事迹）。四川泸州的“红联站”一派群众组织因反对刘、张夫妇而遭到有军分区及外地群众组织武斗队参加的“武装支泸”武力围剿；贵州的“四一一”派群众组织因反对李再含也遭到武装镇压。1969 年中共“九大”之后，李再含先于刘、张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抛弃。当中央批判李再含的这些讲话传到当时的泸州“红联站”一派群众中时，自然引起强烈反响，得到辗转传抄。因是转抄件，其中个别文字特别是提到的贵州有关人名或有错讹，望知情者指正。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有的，不知是否该处有文字被听掉或抄掉。

周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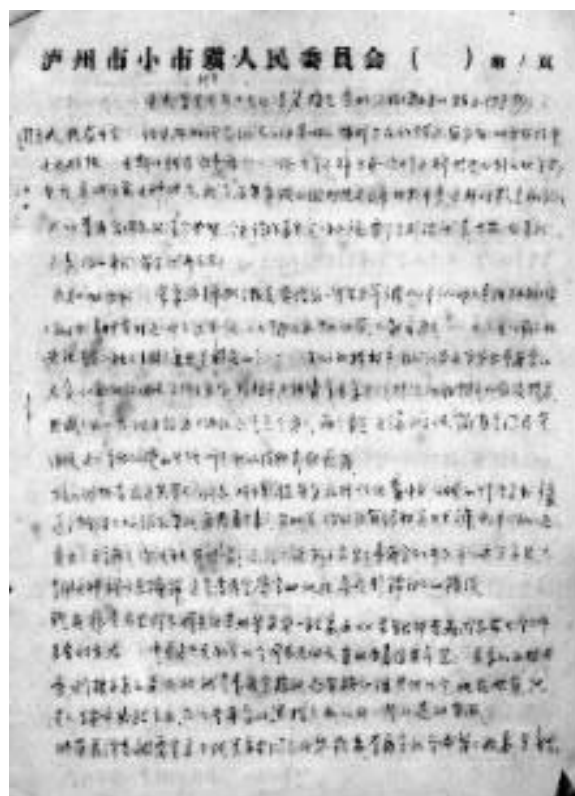
现在开会。经过两批同志回去工作，贵州的形势正在好转。还有少数地方在顶牛，这也难怪。长期的错误领导嘛……二月一次是这样，三月一次又是这样。情况比别的地方都严重。造成目前这种情况，就是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就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今天请你来开会，你还说，要是个别谈就来，大家一起谈就不来。你的身份、架子就那么大？

九月二十四日，我们三个常委向主席做了汇报，要增派一些生力军，调×××军×××师到贵州协助工作。你们刚来时贵州还那么武斗。“七二九”，铜仁和其他地区，不能容忍了。……“七二九”以前不报告，就是个小独立王国。（康老：是威虎山。）……你们的检讨中，我们认为应当写出李再含的名字。山西他们回去公布了名字，刘格平、张日清全来京学习了，情况就好转了。山东没提名，照顾了他一下，但王效禹又讲他还是六个第一，两个委员。这像什么话？简直是国民党作风！这不是我们党的生活。听了我们皮肤都起疙瘩。

核心组报告，在这共有七个同志。张琦同志虽有派性，但他靠中央，反映的情况多数可靠。这个检讨不知谁起草的，康老看出来，写的说，你们没有很好突出毛主席，似乎你们还是突出毛主席了，还说不适当的突出了李再含，似乎还可以适当突出。不是用这样词句来掩饰。这是李再含签字的，他就喜欢粉饰自己的错误。

现在将蓝亦农同志调来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由××军军长张荣森同志带×个师来贵州支左。中央这次先派了七个同志先回去。有的当着徐英年骂，一条条的反对七条。这个根子怎么造成的？就是李再含搞的，还有核心组其他几个。地区也有。就是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按李再含的黑指示办，以及一些小道的东西。

张荣森同志就要走马上任。蓝亦农同志任第一政委，李再含就变成第二政委。蓝亦农任核心组长，成员名单另公布。山西也是新增加了新生力量，调进了×××军，情况马上就改观。山东部队是好的，就是王效禹自己造成派别，自己夺自己的权，把部队搞乱。杨得志同志领导起来后，逐步就好转了。何光宇、石新安同志还是回去工作，他们也有错误，已作了检讨。铜仁问题，韩国锦（韩站起来）你要负责，听说你还有检讨。像李再含，刘安民，康岩中，孙昌德，刘金池，都应当下来学习。你们三年多不学习，远离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九大”后你们还不接受教训，耍两面派。暂不改变革委成员。留个机会观察李再含一段。以观后效。党的核心组要改变。可以告诉你李再含，中央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失掉了



信任。虽然没有完全失掉。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 18 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就连李立三也没敢这样胆大妄为。你们一块的同志都干什么去了？竟没有人抵制。

贵州过去就没有听到一个人反映，只有×××师反映了，而你们铁板一块，没有反映。这里还有问题，我们就要谈得一些。

希望回去的同志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要收枪，搞好联合，留下的要好好检讨，李再含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你造反也才三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三十多年，我们都敢批。对你还不是要批。

我们还是一批二保三看。改好了，还是欢迎。（康老：去年十二中全会上就批评了他，他还是坚持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再不能在贵州小天地称王称霸了。你们再搞，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伟大的党，总是有办法的。

陈伯达同志：

这次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很好，揭露了李再含的假面具，打破了李再含的独立王国，搬开了李再含这个绊脚石，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使毛主席的部署可以贯彻下去了。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

李再含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反动典型。

康生同志：

今天有很多同志参加会议，有些同志长期受李再含的蒙蔽，对过去的情况不完全清楚，利用这个机会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同志们。

李再含同志，过去不认识。记得他反对李井泉、贾启允，夺了权之后到北京一次，准备成立革委会，我们很高兴。这次会议我参加了。我问了李立现在怎样，他们说没有解放。我向他们介绍了李立过去的情况，我说，李立是老党员，一九二七年入党，四十年党龄了，在延安一起工作，有点毛病，但可以做点工作，老革命嘛，如能检讨好，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工作。供同志们参考。讲这个话没错，讲早了点。李再含同志不同大家商量，就把李立突然解放了，上了主席台讲话。李立感恩戴德，一下子睡在李再含那里。他和李再含一道对抗中央，自己犯了错误。李立你应觉悟一下，不是李再含解放了你，也不是我的几句话解放了你，是毛主席的政策。你那么搞，上了当。有的野心家用小恩小惠拉拢人，把你拉到泥坑里去。要警惕。

第二次是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的经验，经毛主席批准搞归口大联合。这本来是贵州很好的事情，是群众运动的创造。李再含把这个厂搞得一塌糊涂。把毛主席树立的标兵搞垮了。同志们想一想。以后我们抓得少，贵州没有什么报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似的。李再含的帮手们说过去贵州是很好的，中央抓坏了。以后知道，是你李再含发枪武装一派，镇压群众，对中央封锁。从解决云南问题知道，李再含说××军××军是薄一波的部队，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为什么李再含这个同志这样胆大妄为？向记者发表谬论，敢于把毛主席的军队说成是薄一波的部队。

大概是去年，我想看看小报刊物，偶然在新贵州通讯发现李再含、李再含、李再含的讲话、插话，看了大吃一惊，很少在党内看到这些文章和讲话，对革委会任意推翻，对群众组织任意取缔，这么凶！其中还有张明、张安民的插话，刘安民的插话，没有看到李立的插话。在这个当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北京一个反革命，造了一个假文件，叫《五个回合的站队》。省革委、省军区发了文件，要广大军民组织学习讨论。（总理：陈北蝉同志，你们那里搞了“五个回合站队”吗？陈北蝉同志讲了贵阳的情况，讲了李再含按1966年“八三一”、夺权前后划分造反派以后，总理说：李再含定的造反派、老保，就是不准人家革命。要看鲁迅的文章。）说老造反也是假的，是以赞成李再含为标准，否则你就是老老造反也不行。我们奇怪的是，将这个东西发到连队，发给群众学习，不请示中央，怎么认为这是中央文件？

你们的措施第一条提出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这是好的，但是你们提到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毛泽东思想，你们把鸡毛蒜皮的事也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吗？很不严肃。吃饭、睡觉也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吗？

去年二月，李再含同何光宇到北京来告云南的状，就是告××军××军的状，

我们正式接触，他对贵州问题一句话不讲，在这我看穿了他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问他贵州的情况，我们几个同志硬着头皮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五分钟说一句话，有气无力。

去年十月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我不同李再含一个组，当时春桥、法宪同志参加，曹轶欧同志参加，会上批判了朱德，批判了邓子恢，也批判了李再含。我问曹轶欧同志，李再含怎么样，她说李再含不在乎这样批判，他面不改色，无动于衷。李再含真本事！

第三次是今年二月，何光宇来了，昆明谭甫仁、梁中玉、陈康来了，×××师×××师也参加了，对李再含又一次批评，×××师政委周学臣揭发得多，有点气愤的是赵琴同志。王有福比较客观一点。“七二九”事件，吴副总长打电话问刘金池，刘金池讲假话，核心组统一口径，欺骗中央。我在夜里打电话找张明（过去是我的勤务员），要他给老首长讲点实话。他说我们不知道，是群众搞的，我们制止不住。骗人的技术不高。他说七月二十七日开了会，二十八日开了会。我狠熊了他。我说你们是有领导有计划干的，你们要拿出党性，要不要党？结果他说了：是我们商量同意的。李再含同志，若你是在中央工作的，你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李再含：错了。）错了，这是白话，抽象的语言，一点用处没有。

（李再含：这是镇压群众。）镇压群众？中央不是群众。（总理：你就不敢承认欺骗中央。李再含：是欺骗中央。总理：你就是这样认错？你讲到错误时的声音比蚊子的声音还小，不敢正视错误，讲到别人凶得很。）我讲的这些不是谣言，我讲了许多事实。（纪登奎：这次他一来就同我谈一次，说贵州的问题在云南。我不了解情况，我转告康老，把康老的指示转告他，他不学。）你到时候了，说你是小太阳，这个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把你说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林副主席讲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不要说大树了，连稻草都不如！你要觉悟起来，不要花岗石脑袋，你是共产党员，候补中委，革委主任，核心组长，还是贵州小太阳，哪够得上小太阳！

这里讲讲孙昌德同志。有一次我在人大会堂开会，讲了工代会被知识分子篡权，没有点名，是讲的徐英年、孙昌德，山东的韩金海。觉悟最快的是徐英年，第二天他承认了。抵制很久的韩金海，他现在有了觉悟，他过去假装工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工人。……孙昌德还是个留学生。

这个会开得好，除个别同志外，都有所觉悟。你们光说感动不行，你们要揭露李再含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错误，你们的文件不敢讲这个问题，没有点李再含的名，你们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师有错误，与李再含的错误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希望你们在蓝亦农、张荣森领导下，好好把工作搞好，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好，紧跟毛主席，遇事多请示。

【故纸堆】

一个社队企业的两份报告

按：这是任冬林先生从废品回收站废纸堆中淘出的民间史料中两份农村社队企业报告，没有经历过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一个小企业要购买一点生产设备和原材料是何等麻烦，要报告请示多少上级部门。同时还得给自己的生产需求加上许多政治性的前提，套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以求得一个满意的批复……现在一般人对文革民间史料只注意到传单、小报等群众组织印刷品，没有重视这类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因而这类文字“化石”存世的不多，亟应抓紧抢救。原文中的错字在方括号内加注了正字。

最高指示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新开人民公社方元大队综合企业加工联合厂

关于申报 1970 年生产以黄草纸为主的农副业加工

所需要原材料的报告

新开公社革委会：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方元大队，乘着这一股强劲东风，冲破重重阻力，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大砍社队企业，搞清水衙门的三光政策，对我大队上一股反革命妖风开展了激烈的搏斗，全体贫下中农大诉没有办企业的痛苦，彻底批判“三光两靠”的流毒，终于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年代里，于 1967 年 4 月 1 日开始筹办工厂，经过 30 天的苦干实干，在 1967 年 5 月 1 日正式投入生产。直至 1969 年 12 月底止，由一穷二白，荒田遍野，建设成了一所农村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 1200 多平方米面积的综合工厂。共计产值 4 万余元，固定产值 2 万多元，共有职工 62 人，设有打米、弹花、轧花、造纸、养殖业、林业、打铁、木工、篾匠、泥工、缝纫等项目。

自从 68 年体制调整撤区拼【并】社，将我大队从麻塘区新开公社划到箬口地区龙湾公社，以致计划一直未报上。后一再向上级革委请示报告，共达十次，县革委生产组批准，从 8 月份起，每月报给方元工厂生产用煤 3.5 吨，而龙湾供销社拖到在 9 月 9 日供应煤 4 吨后，一直拖到 12 月中旬才供应 1.5 吨，所以我

大队工厂一直停工待料，没有很好的发挥工厂应取得的作用，浪费了人力物力。从 1969 年 11 月份，又把我大队划到了麻塘区新开公社，但供应原材料物质还是没有落实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掀起 70 年工农业生产新飞跃的教导，我们大队全体贫下中农要以革命加拼命，死了也甘心，夺取 70 年更大飞跃，向毛主席敬献忠字，特提报 70 年度所要用煤、用油、用炭、用木材、机械动力、用布，计划如附表，旺【望】从速作出安排，以利生产，请批示。

1970 年元月 10 日

地县革委会、地县生产组、县人民生产生活生资站、县人民生产生活生资站日杂批发部、麻塘区革命领导小组、新开供销社、新开（供销社）驻岳采购站

附：70 年度方元工厂用物资计划申报表（略）

最高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新开人民公社方元大队关于请求一部 20 匹马力柴油机、 6 个立方米木材与每月用煤 5 吨的报告

新开公社革命委员会：

我大队在 69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岳阳县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站日杂批发部（69）日革培字第 023 号关于方元大队 70 年生产黄草纸需要解决一部 20 匹马力柴油机、6 个立方米木材与每月用煤 5 吨的报告，和 70 年为国家生产黄草纸 1500 担，为满足全县广大妇女卫生用纸及群众其他生活用纸需要而下达的任务一份。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亦工亦农和以农带副，以副促农的精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保证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目前我厂已由 2 个槽子扩大到 4 个槽子生产，这样带来了一些困难，而最突出的是带来了原料加工的困难。因此，特请求解决一部 20 匹马力柴油机和 6 个立方米木材及每月用煤 5 吨，特此报告，旺【望】从速妥当安排，以利生产，请批示。

新开公社方元大队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五日

主送：省革命委员会

省生产组、省生资组、省机械局

地革命委员会、地生产组、地生资站、地机械局、地煤建公司

县革命委员会、县生产组、县生资站、县日杂批发部、县煤建商店、县农机水电站、县木材商店
区革命领导小组、区农机站、区供销社
新开供销社、新开供销社驻岳采购站、新开公社农机站、
新开公司方元大队企业加工厂

【故纸堆】

史料上记载的老校工徐霈田之死

周继能

我收藏有一份《打倒联动！砸烂联动！》海报，是1967年3、4月间，我在学校（广州第十七中学）大字报栏揭下来的，收藏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了。

这张宣传海报，是当时配合“联动罪行展览会”的。海报中出现一位老人尸体的照片，尸主是北京六中校工徐霈田：

我还保存着另一份题名为《血》的油印材料，由北京六中红旗红卫兵编写，北京女六中翻印，记录了1966年8月之后北京六中部分红卫兵虐待、杀害多人的情况，其中说到了徐霈田被折磨至死的详细情况：

我校退休老工人徐霈田，68岁，1937年以前在旧社会戏院里当茶房多年，1937——1940年在北师大当工友，1940——1956年在北京6中当工人，1956年退休后，因单身一人，一直在6中住宿。解放后，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尤其是退休后因病几次住院都治好了，更加热爱党，他经常对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的老命早就没有了。解放后，在6中当工友期间，工作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以校为家。

今年9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小撮人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撵出学校，导致他无家可归，徐在街头流浪两、三天后由派出所送回学校，给学校、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一天，天下小雨，以朱支前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始对徐进行迫害，他们先将徐拉出屋外强迫徐跪在地上，并脱下自己的鞋令徐用嘴叼着，并让徐自己骂自己是“老混蛋”。这还不过瘾，又把几根木棍放在地上令他在地上爬行，一直爬行至六、七十米处的厕所里，然后将徐推入小便池叫他打滚。徐全身被尿液湿透，再看徐已经不像样子了，徐不能站，刚站起来就摔倒了。这伙暴徒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此后又折磨了几次。

1966年10月3日，下午，徐被王昌明叫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先是用冷水泼徐的身体，喊道“冷啊！冷啊！”，然后用开水向徐霈田身上浇。王、陈一边浇，一边狞笑：“老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惨叫着“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根本不理，反而浇得更厉害了。他们把老人的头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折磨完后，老人爬回

宿舍，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10月4日早晨徐要求治疗，不许他出门，不许他治疗。

（10月）4日晚10时40分，红卫兵又把徐霏田拉到厕所进行折磨，他们在房梁上安好绳索，地上放个板凳，然后把灯关了。他们强迫徐自己爬上去套上绞索，但徐霏田被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能爬得上去呢？这伙暴徒就哈哈大笑，最后把徐霏田活活勒死了。

杀害徐霏田后，他们关了灯，强迫被关押的教师轮流到厕所里，在黑暗中去抱死尸，而这些红卫兵在门外装鬼叫……

传单上所述情况是否完全属实，笔者无法考证，但退休老人徐霏田死了，被“革命”折磨死了，不是自己因老、病而死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非正常”死亡，则是确实的。

胡杰先生拍摄的纪录片《我虽死去》，片末有一份长长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单，里面就有徐霏田。

文革死难者千千万万，能留下影像资料的，凤毛麟角。这份海报，算是留下一份见证，见证一个卑微的生命，在“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面前化为齑粉。

【昨日心迹】

献血

（日记两则）

向卫国

按：本篇原载《西南师大附中老三届校友聚会纪念册》，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文革中是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初六六级女生。当时西师附中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八一五派的“无产者”，一派是反到底派的“布尔什维克”。1967年大规模武斗期间，西师附中所在的重庆市北碚区被八一五派控制，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成员逃亡在外，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日记所写献血一事的背景是：1967年9月12日，因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经过一个多月真枪实弹大规模武斗的两派已经停火交枪，武斗中被赶出校园的反到底派重庆工业学校红岩兵团一些学生按中央“复课闹革命”要求返校，当他们列队走到校门前时，突遭占据学校的八一五派枪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多人，一人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1968年9月12日 星期四 天气晴

血！伤员缺血！“炮声隆”广播站播送了这一消息，不少反到底战士、革命群众及八一五战士涌向体育馆（本刊注：重庆市体育馆一带当时是反到底派工总司、农总司、红中司、机关司令部等组织驻地），自动加入献血队伍。我们十几

个女生本来打算下午到体育馆照相，一走到体育馆，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上车到了外科医院，抢救伤员要紧，一切服从它。

到了医院一看，献血的人不少，真是“阶级友情深似海，一人有难万人帮”。因人太多，于是宣布只要学生献血。我校十几个女生去验了血，只有四人是B型，其中一人血管不好找，一人身体差，我是O型，如B型不够，就可以献血。一直紧张地等待着。可最后只有两位B型的同学刘德群和鲁万兰献了血，其他的人都深感遗憾。我们把二十几个鸡蛋送给了伤员，但愿他们尽快养好伤，与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1968年9月13日 星期五 天气阴

真是可惜极了，昨天我们献血的那位伤员因伤势太重已牺牲了。又一战友永远离开了我们……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死难的战友，安息吧！

昨天因献血没照成相，今日上午同学们又聚集在一起，到我们战斗了一年多的体育馆照了相。并在大桥（本刊注：指嘉陵江大桥）、人民礼堂留了影。战友们一起战斗了这么久，留个影也是很有意义的。



（上左图：西师附中反到底派“布尔什维克”部分女生合影；上右图：西师附中八一五派“无产者”部分女生合影，照片上题词“无产者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均原载《西南师大附中老三届校友聚会纪念册》。照片虽已随逝去的岁月而模糊了，但花季少女的笑容仍清晰感人。以后的人们谁能想到当年她们曾为了表示对同一个领袖的忠诚，为了同样一个“革命”目标，呼喊同样的“革命”口号而展开你死我活的血火厮杀……）

【昨日心迹】

文革一周年时北京见闻

（日记数则）

王端阳

按：本篇节选自王端阳自印书《红卫兵日记》，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王端阳，1947年生，文革爆发时是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生，其父王林时为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专业作家。王端阳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从云南入伍。后调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创作组、铁道兵文工团创作组。1986年调中国文联，曾任《中国摄影报》新闻部主任、《民间文学》副主编。写过电影《红象》、《索命逍遥楼》，电视连续剧《京都神探》及一些小说、剧本、散文等。2007年退休。2008年，王端阳将他父亲的《文革日记》(1966.6.1—1968.5.19)和他自己的《红卫兵日记》(1966.5.30—1968.9.16)整理出来，自印成书，分赠亲友，其史料价值已经引起文革研究界重视。现王端阳正在整理他父亲的全部日记。

5月27日

上午九时出发骑车去北京。正赶东南风，顶风，每小时才走十公里。吃了大苦了，半路王尧自行车后胎破了，又得推着走。后来找了个农民给补上，到河西务就用了九个小时。以后风停，四个多小时一直进了北京，到了地安门一次车都没下过。要都像后半截那样，八个小时就能到北京。到京后膝盖屁股都痛得厉害。

住在妈妈家里（本刊注：作者的母亲刘燕瑾，时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是文革前电影故事片《昆仑山上一棵草》中女主角惠嫂饰演者）。

5月29日

今是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四三”和老红卫兵都举行集会，本都在体育馆，后为不冲突，都改了地方。老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四三”去午门里。我们去午门，没让进。去广场，看了他们演出的红卫兵组歌，还不错，回津自己也搞一个。

晚去地院看青艺、歌剧舞剧院的演出。《收租院》排得可以。

5月30日

下午批斗阳翰生、罗尔纲等，在历史博物馆内，由青艺等组织，康洪兴是主席。对方把小康打成政治扒手。他就是一个青年造反派，革命小将，很好的，没演过坏剧、坏电影，那些问题不少的却受到保护。之后，演出《早春二月》。

克平骑车来了。

5月31日

上午去八一学校参观“联动”展览，没让进。这帮人就是门票挂帅，刻薄之极。人是有思想的，要突出政治，如只是见票就让进，不照顾特殊情况，那换一个狗熊都行。

下午去颐和园游泳、爬山，照了两张像。之后去北大，在主席像前照了两张。晚看电视《智取威虎山》，很好。

6月1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整整一年了。我认为中央《五一六通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共产党宣言》。

上午去几个中学看了看，没什么劲。之后去美术馆看主席摄影展览。

6月2日

早去八大处，爬上虎头山。下来时已三点，又去碧云寺、卧佛寺、香山。鬼见愁没来得及上去。樱桃沟没去。

6月3日

睡了一天。

晚去大众看评剧《智取威虎山》，居然还是“名演员”马泰唱的，可没看三场我们就走了，没劲。回来看电视，也正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真带劲，真是一地一天。

6月4日

上午去看红卫兵展览。有许多严重问题，把过去老红卫兵的功绩一笔抹杀，仅突出了一个李冬民。运动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受高压，剩三人，没写。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没有，北大附中反工作组没有，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没有，“八一八”主席第一次接见没写几笔，宋要武给主席带袖章的照片没有……不突出两条路线，反动对联的经过没有，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的，可全都当成反面教材，问题很严重。三十一中红卫兵造反就是有理。一看就知道这是有宗派主义的人搞的。

克平早返津。

6月5日

上午去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相。之后去女一中，北京中学也没什么劲。

中午宋珍阿姨来了，谈了二个多小时。

6月6日

上午与剧院（本刊注：指作者母亲工作单位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去八一中学看《联动展览》。打砸抢一段学校都是很凶的。我的看法主要在干部子弟集宿制上，这才是真正修正主义的苗床。

……现大专红代会内部争权十分厉害，我就讨厌打内战。听说今凌晨陈伯达批评了北大。出门时看到大标语：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罪责难逃！炮轰聂元梓！孙蓬一滚蛋……

6月7日

下小雨，赵勇自己回津。

下午去找小胖、小俞。看了小俞的笔记，还不错，精神面貌好。她俩都“四四”派的，挺恨“四三”的，可我就是“四三”的。她们也觉得在北京没事干，想去农村劳动，我把我要长征的看法说了，她们也想出去。遇见杨三白，她前两个月和小胖到天津住我家一个星期之久。蒯大富给她写过信，说她是真正的左派，可现又说她不可救药。

【编读往来】

丁蕴华谈杜钧福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上期杜钧福的《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对文革初期的工作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值得重视。

长时间以来，在文革研究中很少再看到对工作组问题的研究了，似乎工作组就是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或者反过来就是一个代表上级党委执行“维稳”任务却成了替罪羊的问题，就是那么一点事，不需要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了。实际上工作组问题是文革初期一个很重大很复杂的问题，许多后来发生的问题都与之有关。当然，工作组在文革初期到底是起到了“维稳”作用还是起到了挑起动乱的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我以为当时各地派出的工作组，总的出发点应该还是“维稳”（当时有哪个领导干部能领会到老毛要让“天下大乱”的意图？），但是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的习惯思维下，在老毛一心要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思想主导下，任何“维稳”的努力都只能是白搭甚至适得其反火上浇油欲稳反乱。总之这里面情况很复杂。毛对工作组的批评实际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土改工作队到后来“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他搞运动从来都要依靠工作组，撤销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挖空心思编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名，不过是他的整人策略而已。其实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与“资产阶级”毫不相干，而是长期以来老毛搞整人运动所惯用的那一套——只要看一看他后来派出的工宣队、军宣队在“清队”“深挖五一六”当中搞的那些作法就够了，那不同样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吗？因此应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名，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反动路线”。

希望看到更多像杜钧福先生这样大量搜集资料，从不同角度来对工作组问题展开再研究的文章。

杜宇秋来信谈蔡文彬文章

上期《昨天》蔡文彬忆赵紫阳一文，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令我意外的是，作为一个当年的造反派头头，蔡文彬的思想与我所接触过的大多原造反派头头很

不一样，他对文革历史能够认真反思，而不是抱残守缺地坚持认定毛泽东伟大英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是很不容易的。蔡文彬所写到的赵紫阳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也让人十分感慨，能够这样不带偏见地平等相待，人性化处理、化解矛盾，把造反派首先看成是人而不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不仅是一种领导艺术，更是一种有远见无私心的领导风范。这不是可以简单地学得到的。没有自身的修养和思想水平，哪怕你作出多少条文规定也不行。

不知蔡文彬是否还写有他个人文革经历的回忆录？希望能读到。